

研究論文

二十一世紀臺灣青少年性別角色態度 之形成與變遷

呂玉瑕 周玉慧

呂玉瑕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通訊地址：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Email: luyh@gate.sinica.edu.tw。周玉慧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Email: jade@gate.sinica.edu.tw。作者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與編委會極寶貴剴切的修改意見。

收稿日期：2014/12/2，接受刊登：2015/9/17。

中文摘要

本研究利用2000-2011臺灣青少年生命歷程研究的縱貫性調查資料，探討臺灣在進入21世紀的社會轉型中青少年性別角色態度的型塑機制及其變遷軌跡。研究結果指出青少年比成人傾向自主的性別角色態度，而且女性較男性認同自主的性別角色。根據社會化理論及處境論（象徵互動理論）的觀點並應用成長曲線模型分析青少年成長的生命歷程中家庭、學校、社區以及成年後的生活經驗對性別角色態度的影響，發現父母自身的性別角色態度對青少年男女的性別角色態度皆有顯著的傳遞作用，其他家庭背景及學校教育因素的影響因性別而異。而父母角色示範作用僅在青少年早期有顯著影響，隨著青少年的成長，父母價值觀念及家庭文化內涵比父母角色示範的影響更大。

成長曲線模型的分析結果進一步指出青少年早期形成的性別角色態度會在後來經歷的處境中調整、再現或轉向。在國中以後的生活經驗比原生家庭社會化背景更明顯的影響成長階段及成年初期的性別角色態度。本文並討論原生家庭的社會化經驗對於個人性別角色態度變遷的長程及隱微的影響。

關鍵詞：性別角色態度、青少年、社會化、處境論、成長曲線模型

The Gender-Role Attitudes Construction from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in the 21th Century's Taiwan

Yu-Hsia LU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Yuh-Huey JOU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a panel survey of Taiwanese youth conducted between 2000 and 2011, we investigate the formation of adolescents' gender-role attitudes, and the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attitudes during their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based on socialization and situational theories. Our data indicate that adolescent attitudes are increasingly egalitarian compared to those held by adults. According to latent growth models, socialization exert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adolescent attitudes, but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females and males. Further, we found that parental attitudes are central to the formation of attitudes among both young females and males, with family cultural contexts as better predictors than parental role modeling as adolescents age.

Last,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current life situation is a better predictor of adolescent gender-role attitudes than family background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The long-term influences of early family socialization on the adolescents' attitudes are discussed.

Keywords: gender-role attitudes, adolescents, socialization, situational perspectives, latent growth-curve model

一、前言

本研究探討臺灣於21世紀初的社會轉型中，青年人從少年到成年期間性別角色態度的型塑因素及變遷。臺灣自解嚴以來，社會朝向多元化發展，民衆價值觀亦逐漸轉變為多元及開放。其中民衆的性別角色態度在社會轉型中更經歷了顯著變遷（呂玉瑕 2011）。一般人的性別角色態度與社會的性別階層結構及家庭內的性別角色息息相關；而青少年的性別角色態度影響其日後的工作及家庭，更攸關未來臺灣社會及家庭的性別關係，值得深入考察。本研究以生命歷程的觀點切入，探討青少年在成長至成人的過程中，家庭、學校、社區、婚姻以及職場的經驗如何型塑其性別角色態度（以下簡稱GRA，Gender-Role Attitudes）以及在成長過程的變遷軌跡。

1987年臺灣解嚴後，社會因民主運動而日趨開放的同時，亦帶來社會價值觀念的轉變；在政治、經濟、及社會層面，皆展現了比過去較為多元的現象。許多制訂於1930年代，傳統父權體制下的法律，陸續被提出修正。而保障兩性平等工作權益的「兩性工作平等法」亦於2002年實施（法務部 2014）。法律的修正顯出臺灣社會的父權體系的鬆動，以及平權意識抬頭的潮流。

隨著臺灣經濟發展，已婚女性就業率顯著提昇，傳統「男主外女主內」性別意識型態亦浮現調整趨勢。勞動力統計顯示90年代臺灣婦女勞動力的增加主要是來自己婚婦女勞動力的大幅成長：有偶婦女的勞動參與率由1980年的33.2%增為2006年的48.4%（行政院主計處 2007）。有學前子女的有偶婦女的就業率更逐年提升，由1980年的29%增至2006的58.14%。對女性婚育離職的研究亦指出，女性結婚生育後及子女學齡前持續工作的比率在1980年後顯著提高（簡文吟、薛承泰 1996）。

學校教育方面，隨著性別階層結構的變遷，1997年教育部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將兩性平等教育的理念與內涵融入九年一貫課程架構之中。教育部於1997年公布「各級學校兩性平等教育實施要點」，規定各級學校推展兩性平等教育，並於2004年公布實施（法務部 2014）。

這一代的青少年在臺灣社會快速轉型的時期成長，經歷多元的社會文化脈絡、平權意識抬頭的氛圍以及學校教育，本研究試圖探討這一代的青少年的性別意識的發展軌跡，探討原生家庭的社會化、成長過程的學校教育、以及生活社區處境對其性別意識發展的影響。此不但是青少年發展及教育的重要問題，也是性別及家庭研究者的重要課題。

本研究亦將探討在青少年步入成年的生命歷程中，原生家庭的社會化背景是否仍持續影響其GRA的變遷。過去的研究文獻對於原生家庭背景對個人GRA在成長歷程的延續影響並無一致的結論。根據象徵論，GRA及行為是有脈絡依賴性的（context dependent），在相似的生活脈絡下會引發並影響GRA及行為的形成（Berk 1985; West and Zimmerman 1987）。Greenstein（1996）的研究指出兒童從原生家庭社會化的互動學習到性別化的符碼（行為的性別意義），影響兒童性別化（包括GRA及行為）的建構，因此，青少年步入成年的生命歷程中，在特定生活脈絡下的過去家庭社會化經驗可能影響其GRA或行為。Cunningham（2001）的研究根據底特律長期的家庭研究資料支持家庭社會化效應持續影響的理論。然而Davis（2007）據美國縱貫性的長期追蹤青少年研究樣本1994-2004 NLSY的分析，發現在青少年成長階段，原生家庭背景對於GRA的影響漸漸消滅，而成長期間的生活經驗對於GRA有更大的解釋力（Davis 2007）。本研究利用縱貫性資料及成長曲線分析，將探討青少年成長至成人的生命歷程中，原生家庭的社會化背景影響GRA的持續性。

過去的研究由於資料的限制，無法縱貫面地探討青少年成長生命歷程中性別角色意識的變遷，自2000年起中研院社會所進行「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的長期研究，目前已累積超過十年的追蹤資料。本研究利用該資料得以檢視不同時間點的生命歷程因素（life-course factors），包括不同時間點的家庭狀況、學校生活、就業狀況等。我們選取該計畫2000年國中三年級學生的樣本，包括2000、2003及2006及2011的四波縱貫調查資料，探討青少年進入成年的過程中GRA的形成、變遷及影響的機制，並分析是否存在性別差異。

二、過去文獻及理論架構

過去對於GRA的研究文獻，主要根據社會化理論（socialization theory）及象徵互動理論（symbolic interaction）。以下分別由兩個理論觀點，探討青少年GRA形成或變遷的機制。¹

從社會化理論觀點，GRA是個人成長過程中的社會化結果。個人成長過程中，社會的性別規範透過家庭、教育及社會環境接觸影響個人GRA的形成。過去的相關研究指出家庭社會化對個人的GRA形成有最重要影響（Mortimer and Simmons 1978）。如Goffman（1977）所言，家庭是社會化的訓練所，子女在成長的家庭生活中觀察家庭成員之間的

¹ 目前為止，並未見針對臺灣青少年性別角色態度的發展或變遷進行實徵資料分析的研究。雖有社會心理學取向對於青少年性別角色發展的研究（何英奇 1981；何青蓉 1986；鍾鳳嬌 1989；鄒慧英 1989；黃文三 1997, 1998），然而偏重人格特質的性別差異，多數根據社會文化對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概念，分析青少年的性別角色特質類型；與本研究所探討青少年對於家庭／社會角色的性別分化的態度，有不同的意涵，不宜併為一談。本研究對於過去文獻的探討乃根據國內外對於成人性別角色態度的研究，以及國外的青少年性別角色態度研究文獻。

互動所溝通的性別意涵。其中原生家庭背景，包括父母特質、家庭社經地位及宗教信仰等，會在家庭社會化過程中影響子女的GRA（Tangri 1972; Mason and Bumpass 1975; Huber and Spitze 1981; Thornton, Alwin, and Camburn 1983; Rindfuss, Brewster and Kavee 1996; Cunningham 2001; Charles and Cech 2010）。父母對子女GRA的影響機制包括父母教導（discipline）及角色示範（role modeling），父母根據自己的性別角色觀念建立家庭的規範來教導子女，日常生活中對子女行為的規範可能因子女性別而不同（Biddle, Bank and Marlin 1980; White and Brinkerhoff 1981; Block 1984）。而父母本身有角色示範作用，子女藉著觀察或模仿父母行為來學習性別化並形成GRA（Bandura 1977; Thrall 1978; Scanzoni and Fox 1980; Koopman-Boyden and Abbott 1985; Hochschild 1989）。

社會化理論預設一個靜態的、單向的影響模式，包括無條件接受的被社會化者以及有權力的社會化代理人。另一方面，象徵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學者主張個人的社會化是一生持續的動態歷程，社會化的代理人可能擴及教育、職場、社會組織等社會生活中互動的對象。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透過社會文化規範的認識，並藉著人際互動，持續建構對於性別角色的認知及態度（Blumer 1969; Thornton and Freedman 1979）。人際互動鑲嵌在文化脈絡下，互動行為被賦予性別合宜性的象徵意義，而個人由於日常生活所接觸的經濟、文化環境、互動對象，及生活方式不同，可能孕育不同的價值觀及GRA。

以個人與制度環境的處境脈絡的互動而言，象徵互動論亦衍生出個人處境及行動成本的考量，主張性別的態度或行為的建構有脈絡差異（context-based differences）（Greenstein 1996; Perkins and DeMeis 1996; Ridgeway and Correll 2004）；個人的性別態度或行為會隨著個人在家庭關係或社會關係處境所鑲嵌的制度規範或利益結構的制約而調整，即

所謂處境論 (situational perspectives)。若個人所接觸生活圈的制度或規範傾向傳統，採取非傳統態度需要較大成本，因此可能傾向傳統的態度，使符合較大利益的角色安排；反之亦然 (Morgan and Walker 1983; Wagner, Ford and Ford 1986; Liao and Yang 1995; Connell 1998; Bolzendahl and Myers 2004; Cunningham 2008)。此種「接觸」可能以社會學習、教育或個人經驗的形式出現，個人的態度因之可能隨時間變遷；若個人接觸的思維及環境較符合自主的意識，則其態度可能傾向自主；相反地，若處於性別化的文化規範下 (如進入婚姻、成爲父母)，則可能傾向傳統態度來符合規範期許。

本研究假設青少年在個人生命歷程中家庭背景、學校教育、社區及所接觸的社會網絡皆會影響GRA，並假設上述兩派理論皆可能解釋家庭、學校及社區因素形塑GRA的機制，亦預期在個人生命歷程中，早期的社會化或社會學習經驗可能持續影響後期的GRA的變遷。此外，青少年的GRA的形成及變遷的機制是否因性別而異亦值得探討，因此本研究也將分析家庭、學校及社區生活經驗對於GRA的影響是否有性別差異。以下分別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假設。

(一) 家庭社會化的影響

根據社會化理論，本研究預期父母親的GRA、原生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 (包括父母親的職業地位及家庭收入)、父母的宗教信仰、婚姻狀態、家務分工以及家庭的文化資本會影響青少年的GRA。父母親本身對性別角色的認知及態度傾向可能透過家庭規範及對子女的教導，影響子女的GRA。許多實證研究發現父母的GRA對於子女的態度有顯著影響 (Tangri 1972; Acock and Bengtson 1978; Thornton et al. 1983;

Blee and Tickamyer 1995)，其中亦有研究使用縱貫固定樣本的親子代配對資料，發現父母的GRA顯著的傳遞到下一代（Thornton et al. 1983; Cunningham 2001）。本研究預期父母本身的GRA影響子女的GRA，父母性別角色傾向傳統者，其子女可能有較傳統的GRA。

以父母角色示範作用而言，過去研究發現母親的就業與否對子女有角色示範作用，尤其在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規範仍相當程度制約一般人的性別角色社會化，母親的就業角色可能影響子女傾向非傳統的態度（Tangri 1972; Scanzoni and Fox 1980；伊慶春、高淑貴 1986; Rindfuss, Brewster and Kavee 1996; Charles and Cech 2010）。故本研究假設母親就業者，子女會傾向非傳統的GRA。

本研究也假設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特質（包括父母的教育程度、職業地位及家庭收入）會影響子女GRA。此因父母教育程度或社經地位較高者，日常生活中較多異質的連繫機會，較可能接觸非傳統的價值觀，並傳遞到下一代，使子女較傾向非傳統的態度（Mason and Bumpass 1975; Stockard 1980；呂玉瑕 1981; Fan and Marini 2000; Kulik 2002）。過去研究著重探討母親在家庭社會化的影響力，指出母親教育程度以及職業角色對於子女的GRA的影響，發現母親就業或受較高教育較可能接觸非傳統價值觀，並透過日常生活的教化及角色示範傳遞給子女（Powell and Steelman 1982; Harris and Firestone 1998; Fan and Marini 2000; Bolzendahl and Myers 2004），因此本研究假設父親及母親家庭社經地位較高者，其子女較傾向非傳統的態度。

由於宗教信仰關聯到個人的性別意識及實踐，有宗教信仰或宗教參與較高者較可能支持傳統的性別角色（Thornton et al. 1983; Hertel and Hughes 1987; Mason and Lu 1988; Rindfuss et al. 1996; Brewster and Padavic 2000; Bolzendahl and Myers 2004）。而過去的研究亦發現父母

的宗教信仰影響子女的性別角色意識及態度（Brinkerhoff and MacKie 1985; Cunningham 2001），因此本研究假設父母的宗教信仰會影響子女的GRA，有宗教信仰或宗教參與愈高者，子女的GRA較傾向傳統。

過去研究亦發現父母在子女成長期間的家務分工模式有角色示範的作用，影響子女的性別化建構以及GRA的形成（Blair 1992; Cunningham 2001）。因此本研究假設父母的家務分工模式影響子女的GRA；父親相對的家務參與愈低（或母親的家務參與愈高），其子女可能有較傳統的GRA。此外，過去研究亦指出父母離婚的單親家庭缺乏父母傳統角色的示範，子女可能較傾向非傳統的態度（Kiecolt and Acock 1988），本研究假設在父母離婚的單親家庭，子女較傾向非傳統的態度。

與子女教養有關的家庭文化資本亦可能影響子女GRA。家庭文化資本是指家庭對於社會主流階層的文化品味及興趣的培養挹注（Bourdieu 1973, DiMaggio 1982; Dumais 2002）。Bourdieu（1973）認為擁有文化資本，有助於教育成就及社會地位的取得。雖然過去文獻並未直接探討文化資本對GRA或信念的影響，卻有不少研究指出GRA與自我概念的關連（Betz and Hackett 1981; Ahrens and O'Brien 1996），而家庭文化資本有助於提高人文素養、提升自我效能（ability and agency），因此影響子女傾向非傳統的GRA。此影響對女性更為明顯（Dumais 2002），因女性更可能運用家庭文化資本增強自我效能及自信以獲得社會認可（DiMaggio 1982; Persell, Catsambis and Cookson 1992; Dumais 2002）。根據這些研究結果，我們假設家庭文化資本越高的青少年越傾向非傳統的GRA，且家庭文化資本對女性的GRA的影響大於男性。

（二）生活處境的影響

根據象徵互動理論，本研究預期學校、社區生活經驗與個人生命歷程經驗會影響GRA變遷。

1. 學校及社區

學校生活經驗亦可能型塑青少年的GRA。過去研究發現青少年的學業成績與GRA有正相關（Ahrens and O'Brien 1996; Dumais 2002）；由於個人的能力與能動性（agency）與GRA相關連（Ahrens and O'Brien 1996），學業成績表現較佳者可能發展較強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及能動性，因此價值觀念及態度較可能傾向非傳統（Ridgeway and Jacobson 1979; Ahrens and O'Brien 1996）。本研究預期學業成績較高者的GRA較傾向非傳統。

我們假設班級內的性別互動會影響青少年的GRA。從象徵互動論的觀點，由於性別間社會化過程不同，青少年的同儕文化（peer culture）會出現性別差異。過去研究顯示男性表現較多男性化特質，而女性表現較多女性化特質（李美枝、鍾秋玉 1996），同儕之間仍持著傳統的性別角色觀，認為男性應有男性化行為，女性應有女性化行為，此現象在青少年時期最為明顯（何金針 1987）。Eder and Parker（1987）對於高中課外活動的研究指出，男性展現較高的攻擊性與成就取向，較傾向競爭性的活動及陽剛的性別表達，女性則傾向人際關係取向，較體貼細膩的性別表達；班級的異性同學比例高低，將提供不同的性別互動脈絡。因此根據上述研究，我們以班級的女性同學比例為班級內性別互動的指標，並假設班級男性比例較高（女性比例較低），陽剛文化影響較強，男女生皆可能較傾向男性主控的傳統性別文化。女性比例較高時，陽剛

文化影響減弱，著重人際關係和諧的女性活動影響較強，男性對於性別平等的價值較包容；男女生都較可能傾向平等的性別角色意識。

青少年在國中畢業後，教育的分流可能影響其GRA的差異。教育分流指針對不同教育對象採取不同教育措施（如課程內容），透過選擇的途徑使每一個人各依其能力及興趣接受適合的教育（Mulkey 1993; 林大森 1999）。臺灣的中等教育區分為一般中學及技職教育體系有長久的歷史。現行的分流體系，高中及高職的教學目標並不相同：高級中學乃以研究高深學術及專門智能之預備為宗旨（教育部 1979），而職業學校以教授職業智能，養成健全之基層技術人員為宗旨（教育部 1976）。不同的教育目標下教學課程以及政府挹注的教育資源亦有差異（教育部 1994）。高職學生在教育過程中享用的教育資源明顯低於高中學生，包括較高的生師比，較低的教師學歷（廖年淼、劉孟珊 2004）。高職生在課業知識學習上追求的深度廣度不如高中生，加上教育及文化資源較不充分，亦可能較限制接觸較多元的觀念及價值。因此本研究假設高職生可能比高中生傾向較傳統的GRA。

2. 成人階段生活經驗的影響

關於青少年步入成人階段的生活經驗對於GRA變遷的影響，我們假設個人生命歷程的經驗會影響GRA變遷，並檢視青少年的學校教育、就業經驗以及婚姻、成為父母等角色改變帶來的影響。

過去根據長期追蹤資料的研究發現青少年及成年早期，累積學校教育愈高，愈傾向自主平等的GRA（Tallichet and Willits 1986; Funk and Willits 1987; Fan and Marini 2000; Ciabattari 2001; Cunningham 2008），此乃因1970年代以後學校教育的文化脈絡使學生接觸到較平權及個人自主的觀念（Wilkie 1993; Cunningham, Beutel, Barber and Thornton

2005)。Cunningham (2008) 根據長期追蹤資料的研究更發現累積的學校教育對於女性的GRA的影響比後來的工作經驗更重要。過去研究亦指出大學教育使人接觸崇尚自由的思潮及較多元的知識及觀念，對於個人價值觀的重要影響 (Bowen 1977; Webster, Freedman and Heist 1979)。故本研究假設青少年進入成人階段後，仍繼續接受更高的學校教育者的GRA，比離開學校者更傾向平等。又，大學生之中有打工經驗者的工作經驗及接觸的環境可能帶來較廣的網絡關係及較多元的資訊，可能比未兼職者的價值觀念更傾向非傳統，故我們假設上大學的青少年中有打工經驗或兼職者的GRA較傾向非傳統。

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價值觀仍相當程度存續的家庭生活氛圍下，進入職場帶來家庭以外的非傳統角色的經驗，可能影響女性的態度傾向平權 (Thornton and Freedman 1979; Corrigan and Konrad 2007; Cunningham 2008)。Bolzendahl and Myers (2004) 指出進入職場就業的女性由於接觸家庭以外的角色及網絡關係的經驗，可能傾向非傳統的態度。此外，以交換論而言，就業的女性為了達到追求職場成就或其他就業目的，亦較可能傾向非傳統的態度。因此本研究預期青少年進入成人的階段後的就業經驗影響她們的GRA傾向平權。然以當前社會性別脈絡而言，男性的就業經驗不一定帶來有別於傳統認知的性別角色體驗，故預期就業經驗的影響有性別差異。

由於宗教信仰關聯到個人的性別意識及實踐，有宗教信仰或宗教參與較高者較可能支持傳統的性別角色 (Thornton et al. 1983; Hertel and Hughes 1987; Mason and Lu 1988; Rindfuss et al. 1996; Brewster and Padavic 2000; Bolzendahl and Myers 2004)。因此本研究預期青少年個人進入成年後的宗教信仰影響GRA傾向傳統。

此外，青少年進入成人階段後，角色的改變可能會影響GRA的變遷

方向。根據象徵互動論的觀點，在當前家庭制度脈絡下，已婚者或有子女者在家庭及家族關係網絡中採取自主性的GRA比未婚者需較大成本，因此較可能傾向傳統的GRA。過去的相關研究亦發現已婚者或成為父母者較傾向傳統的GRA（Thornton et al. 1983; Bram 1984; Morgan and Waite 1987; Cowan and Cowan 1992; Wilkie 1993; Walzer 1998; Fan and Marini 2000; Ciabattari 2001），因此本研究假設有偶或有子女者較傾向傳統的GRA。

（三）家庭社會化因素的持續影響

本研究除了檢視青少年成長的生命歷程中，個人家庭背景、學校教育及社區脈絡因素對其GRA形成的影響之外，並探討早年的家庭社會化因素是否在步入成年的生命歷程中持續影響其GRA的變遷。

象徵互動理論的學者指出兒童在原生家庭的社會化過程中，父母及家人的特質及其互動所表達出性別的意涵，會被概念化為一種潛在的性別展演符碼（gender markers）（Goffman 1977; West and Zimmerman 1987; Greenstein 1996），對於個人的性別展現（包括性別化、性別意識、GRA）有長遠的影響。

此外，GRA指涉特定脈絡下的行為或觀念，在個人生命歷程進入相對應的生活脈絡中方能具體領會其實際內涵與意義（Cunningham 2001）。因此從象徵互動論的觀點，早期家庭社會化形成的性別符碼，在進入成人後的相對應處境脈絡（如交友、婚姻），可能影響個人性別角色行為及態度的變異性（Berk 1985; Perkins and DeMeis 1996; Cunningham 2001）。

具體言之，在處境脈絡的場域中，既存的社會性別規範及信念、他

者及自己的角色期待，以及個人過去所型塑出來的性別意識及認同，是性別關係表達的重要參考及判準（West and Zimmerman 1987; Greenstein 1996; Ridgeway and Correll 2004），會影響個人對於性別合宜行為的認知以及所展現的GRA及行為。因此，早期社會化形成的性別符碼可能在相應的社會關係脈絡影響個人的GRA。

Cunningham（2001）利用底特律區域研究縱貫1962-1993的30年追蹤資料，探究父母性別角色的傳遞，發現早期父母的家務分工模式透過對子女的家庭社會化影響三十年後子女家庭的家务分工模式，支持此觀點。然而Davis（2007）根據1994-2004 NLSY（美國青少年生命歷程的縱貫研究）樣本的分析，並不支持家庭社會化的持續影響，該研究發現青少年成長過程中原生家庭背景對於GRA的影響逐漸減弱，而成長期間的生活經驗對於GRA有較大的解釋力（Davis 2007）。因此原生家庭背景對於個人GRA在成長歷程的延續影響目前尚無一致的結論。本研究將利用縱貫資料及成長曲線分析模型探究在青少年進入成人的生命歷程中，父母、原生家庭背景以及所處環境脈絡對於其GRA影響力的持續性，檢視下列研究假設：

1. 父母的GRA的持續影響：青少年國中時父母GRA較傾向傳統者，在青少年成長至成人期間將持續影響他們傾向較傳統的態度。
2. 母親就業的角色示範作用的持續影響：國中時期母親就業者，在青少年成長至成人期間將持續影響他們傾向較平等自主的態度。
3. 原生家庭社經地位的持續影響：國中時期家庭社經地位較高者，在青少年成長至成人期間將持續影響他們傾向較平等自主的態度。
4. 父母宗教信仰的持續影響：國中時期父母宗教信仰的影響，在青少年成長至成人期間將持續影響他們傾向較傳統的GRA。

5. 父母的家務分工模式的持續影響：青少年在國中時期，父親相對的家務參與愈低（或母親的家務參與愈高），在青少年成長至成人期間，將持續影響他們傾向較傳統的GRA。
6. 原生家庭為單親家庭模式的持續影響：青少年在國中時期居住於單親家庭者，在青少年成長至成人期間，將持續影響他們較傾向非傳統的態度。
7. 原生家庭文化資本的持續影響：青少年在國中時期家庭文化資本越高，在成長至成人期間，將持續影響他們傾向較平等自主的GRA，且家庭文化資本對女性的GRA的影響大於男性。

三、研究架構

依據上述研究假設的研究架構如圖1。首先建構青少年於國三（15歲）到成年初期（26歲）的GRA發展及變遷之成長模型，其次將影響GRA形成的因素區分為兩大類，其一為時間特定因素，意指型塑GRA的初始因素，主要分為父母、家庭背景及文化資本，學校與社區兩大因素，前者包含父母的年齡、族群、教育程度、家庭收入、職業、婚姻狀態、家庭結構、宗教信仰、GRA、家務參與，以及家中書籍、藝術欣賞參與等屬於家庭社會化效果的變項；後者包括居住地區、國三成績及國三班級性別比例等環境脈絡的相關變項。另一為時間變遷因素（生活經驗因素），意指不同時間階段的生活經驗；對國中、高中、大學階段的青少年而言，不同階段的學業成績表現、班級男女比例、就讀學校類別、就學與就業的選擇、進入婚姻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異等，假設這些生活經驗皆可能在相應階段對青少年GRA產生不同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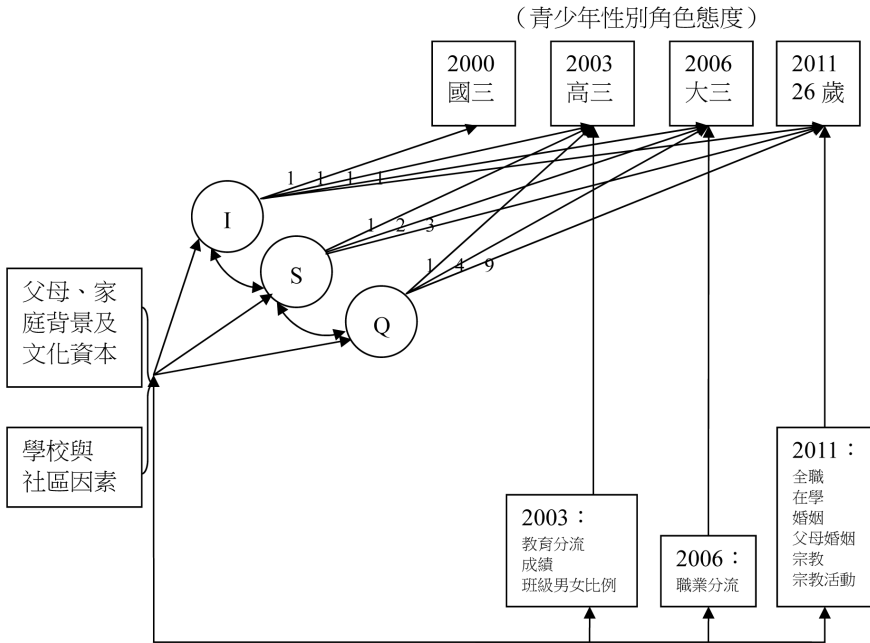


圖1 性別角色態度成長模型及其影響因素

四、研究方法

(一) 調查對象及程序

本研究之資料來源為「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之實地長期追蹤調查資料（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經費補助，伊慶春總主持），第一階段的調查實施期間自2000年至2009年，蒐集了九波資料，第二階段於2011年開始進入成年階段的後續追蹤。整體計畫重點在了解臺灣青少年成長的過程，並試圖由家庭、學校和社區等三個重要社會制度的交互影響切入，探討青少年不同的成長歷程以及影響不同成長模式的可能因素。此計畫

以2000年當時臺北縣市及宜蘭縣國一及國三的學生為研究的母體，其詳細介紹請見：<http://www.typ.sinica.edu.tw/>。

「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計畫並非每波調查均測量GRA，本研究分析包含測量GRA的國三樣本之第一波（約15歲，2851名）、第四波（約18歲，2072名）、第七波（約21歲，1805名）與成年第一波（約26歲，1536名）的學生資料及第一波的家長資料（2800名），調查時期為2000年、2003年、2006年及2011年，學生問卷採取班級施測或問卷留置，家長問卷則由訪員至各學生家庭與學生家長一人進行面對面訪談。扣除家長問卷非學生父母者（含祖父母10名、其他22名、未答8名），針對此四時期的調查均回答者，最後分析的資料為1,053份，² 其中男性所占比例略高（53.09%），關於這些學生與家長的人口基本變項及生命歷程中不同時點的特性分配資料整理於表1。

² 國三第一波樣本人數為2851人，而最後納入分析的樣本數為1053人，為檢視分析樣本與流失樣本（1693人）是否在各項特性上有所差異，進行邏輯迴歸分析。結果發現居住臺北市或臺北縣的青少年流失率較居住宜蘭市的青少年明顯高，佛道宗教者的流失率較無信仰者高，父母籍貫為其他者的流失率較本省閩南者高、父母收入較低者、父母職業地位較低者、未與上一代同住者、較少參與藝術欣賞者的流失率亦較高。

表1 本研究樣本特性分配

變項名稱	人數	比例	缺失 人數	變項名稱	人數	比例	缺失 人數
2000年資料				2000年資料			
<u>青少年性別</u>				<u>居住地區</u>			
女	494	47.91		臺北市	383	36.37	
男	559	53.09		臺北縣	380	36.09	
<u>青少年宗教</u>				宜蘭縣	290	27.54	
佛教	184	17.54	4	<u>家中書籍</u>			
道教、民間信仰與一貫道	286	27.28		10本以下	88	8.87	60
回教、天主教與基督教	31	2.96		11-50本	356	35.86	
無宗教信仰	542	51.67		51-100本	230	23.16	
其他	6	0.57		101本以上	319	32.13	
<u>家長問卷填答者</u>				<u>參與藝術欣賞</u>			
父親	324	30.77		幾乎沒有	707	70.21	46
母親	729	69.23		一年一兩次	193	19.17	
<u>父母宗教信仰</u>				幾個月一次	86	8.54	
佛教	258	25.57	44	一個月一次或以上	21	2.09	
道教、民間信仰與一貫道	545	54.02		<u>國三成績</u>			
天主教與基督教	39	3.86		30名以後	106	10.09	2
無宗教信仰	165	16.35		21-30名	193	18.36	
其他	2	0.2		11-20名	317	30.16	
<u>父母省籍</u>				5-10名	230	21.88	
本省閩南	837	80.33	11	5名以內	205	19.51	
本省客家	73	7.01		<u>國三班級女生比例</u>			
大陸各省	129	12.38		全女生	57	5.41	
原住民	3	0.29		高於50%女生	526	49.95	
<u>母親教育程度</u>				低於等於50%女生	386	36.66	
無、國小	261	25.26	20	全男生	84	7.98	
國中	255	24.69		2003年資料			
高中職	347	33.59		<u>高三成績</u>			
專科與大學	161	15.59		中後（25名以後）	212	21.01	44
研究所	9	0.87		中等（16-25名）	342	33.89	
<u>父親教育程度</u>				中上（6-15名）	309	30.62	
無、國小	178	17.62	43	優（5名以內）	146	14.47	
國中	253	25.05		<u>高三班級女生比例</u>			
高中職	313	30.99		全女生	182	22.81	255
專科與大學	241	23.86		高於50%女生	246	30.83	
研究所	25	2.48		低於等於50%女生	201	25.19	

<u>母親職業</u>				全男生	169	21.18	
無就業	331	33.17	55	<u>高中職就學情形</u>			
非技術/體力工/農林漁牧	244	24.45		高中	476	45.20	
技術工/服務工作和有關工作人員	260	26.05		高職	411	39.03	
技術員/助理專業人員/事務人員	68	6.81		專科	100	9.50	
專業人員/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	95	9.52		未就學及其他	66	6.26	
<u>父親職業</u>				2006年資料			
無就業	90	9.01	54	<u>就業情形</u>			
非技術/體力工/農林漁牧	389	38.94		有全職工作	205	19.47	4
技術工/服務工作和有關工作人員	207	20.72		曾打工	734	69.71	
技術員/助理專業人員/事務人員	87	8.71		全職學生	114	10.83	
專業人員/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	226	22.62		2011年資料			
<u>父母婚姻狀態</u>				<u>成人工作狀況</u>			
有偶	987	93.73		無全職(含服兵役)	172	16.33	
其他	66	6.27		有全職工作	881	83.67	
<u>是否與上一代同住</u>				<u>成人就學狀況</u>			
未同住	830	78.82		無就學	974	92.5	
同住	223	21.18		有就學	79	7.5	
<u>父親年齡</u>				<u>成人婚姻狀況</u>			
35—45歲	595	61.15	80	無偶(未婚、離婚)	969	92.02	2
46—50歲	306	31.35		有偶	84	7.98	
51—59歲	73	7.5		<u>成人宗教</u>			
<u>母親年齡</u>				佛教	120	11.42	2
33—40歲	158	15.60	40	道教、民間信仰與一貫道	274	26.07	
41—45歲	347	34.25		回教、天主教與基督教	44	4.2	
46—50歲	399	39.39		無宗教信仰	606	57.66	
51—55歲	109	10.76		其他	7	0.67	
<u>家庭收入</u>				<u>父母離婚</u>			
0—3萬	165	20.25	238	否	944	89.65	
3萬以上—6萬	338	41.47		是	109	10.35	
6萬以上—9萬	157	19.26		<u>成人宗教活動參與</u>			
9萬以上	155	19.02		從未參加	34	7.66	609
<u>父親家務參與程度</u>				大約一年一次	56	12.61	
全未參與	14	2.30	445	一年數次	191	43.02	
低於50%	487	80.10		每個月一次或數次	116	26.13	
高於等於50%	117	19.24		每週一次或數次	47	10.58	
全部參與	4	0.66					

(二) 研究變項之測量

本研究使用變項主要可分為五大類，包括依變項青少年GRA及自變項青少年個人因素、父母與家庭因素、學校與社區因素以及控制變項。

1. 青少年性別角色態度

包含下列所述之六題與性別角色相關的說法，請青少年回答其贊同度。青少年分別在2000年、2003年、2006年和2011年回答同一組題目，依據非常贊成、贊成、不贊成、與非常不贊成四等級分別指定為1、2、3與4分，以反映分數愈高愈傾向於兩性平等、自主、非傳統的GRA。分別對四時期之GRA題目進行主成分因素分析，正交轉軸的結果顯示此四時期之GRA均為一個因素，其解釋變異量（各題因素負荷量範圍）分別為46.01%（.42~.80）、46.20%（.52~.76）、48.37%（.52~.77）及43.95%（.53~.78）。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樣本對於不同層面的GRA之間相當一致。³ 分別將各時期所屬題目相加，分數愈高代表青少年的GRA愈兩性平等。此四時期內部一致性係數（ α ）分別為.75、.76、.78及.74。

- (1) 家庭中大部分重要的事情應當要由男人來決定。
- (2) 當母親有工作的話，入學前子女比較容易受到不好的影響。
- (3) 丈夫的責任就是賺錢養家，妻子的責任就是照顧家庭。
- (4) 經濟不景氣需裁員時，應該先從（已婚）女性員工裁起。

³ 本研究所顯示青少年性別角色態度的一致性有別於過去對於成人的研究。過去性別角色態度的研究文獻大都呈現性別角色態度的不一致性或多元性；民衆對於不同層面的性別角色態度並未整合成單一面向的態度（Mason and Bumpass 1975, Mason, Czajka and Arber 1976；呂玉瑕 1981, 1982）。

- (5) 一般說來，男性比女性更適合當主管。
- (6) 在工作與家庭發生衝突時，太太應該以家庭為優先選擇。

2. 青少年個人因素

包括性別、宗教信仰、學業成績、就學情形、就業情形等。

性別：以青少男為1、青少女為0。

- (1) 宗教信仰：分別於2003年與2011年詢問青少年的宗教信仰，並將基督教、天主教、回教合併為一類，佛教、道教、民間信仰合併為另一類，無宗教信仰及其他則合併為第三類。並設無宗教信仰及其他為對照組，分別產生基督宗教、佛道宗教兩個虛擬變項。
- (2) 學業成績：分別於2000年（國三）與2003年（高三）詢問青少年的上學期成績。國三學業成績之選項為5名以內、5-10名、11-20名、21-30名、30名以後，將此五等級分別指定為5，4，3，2與1分，分數愈高代表國三學業成績愈佳。高三學業成績之選項為優（5名以內）、中上（6-15名）、中等（16-25名）、中後、很後，亦將此五等級分別指定為5、4、3、2與1分，分數愈高代表高三學業成績愈佳。
- (3) 就學情形：分別於2003年（高三）與2011年詢問青少年當時是否就學及就讀學校，2003年之資料將高中和高職高中部合併為「高中」類，高中職業科、高職職業科、專科、特殊學校合併為「高職」類，未就學和其他（含有工作者24人）併為「未在學」類，並設高職類為對照組，分別產生高中、未在學兩個虛擬變項。2011年之資料則分為「在學」與「未在學」兩類。

- (4) 就業情形：於2006年（大三）與2011年詢問青少年當時是否打工或有全職工作，2006年之資料將「有全職工作」者設為一類，目前有打工和曾有打工經驗者設為「打工」類，無打工無全職工作者設為「全職學生」類，並設全職學生為對照組，分別產生有全職工作、打工兩個虛擬變項。2011年之資料則分為「有全職工作」與「無全職工作（含服兵役）」兩類。

3. 父母個人及家庭因素

包括母親教育程度、父母職業、家庭收入、宗教信仰、婚姻狀態、父親家務參與、家庭文化資本、父母GRA。

- (1) 母親教育：由於父親與母親的教育程度相關很高（ $r = .65$ ），為避免多重共線性，故採取國三學生問卷對母親教育程度的回答，從小學到研究所以上轉換成教育年數，分數愈高代表母親教育年數愈長。
- (2) 父親職業：採取2003年家長問卷關於職業的回答，為開放設計，依據主計處職業分類的中類職業代碼做資料轉換。本研究採取大類職業分類，最後產生了五大類職業職位，分別是無就業，民意代表或行政主管，技術或助理事務工作人員，技術工或相關工作人員，及非技術、體力工或農林漁牧業者。並設非技術 / 體力工 / 農林漁牧為對照組，產生四個虛擬變項。
- (3) 母親職業：母親職業分類的產生方式與父親職業相同。不過，母親職業之虛擬變項以無就業為對照組，分別產生民意代表或行政主管，技術或助理事務工作人員，技術工或助理

事務人員，及非技術／體力工／農林漁牧業四個虛擬變項。

- (4) 父母宗教信仰：請父母回答自己的宗教信仰，並採取與青少年宗教信仰相同併類方式，將基督教、天主教、回教合併為一類，佛教、道教、民間信仰合併為另一類，無宗教信仰及其他則合併為第三類。並設無宗教信仰及其他為對照組，分別產生基督宗教、佛道宗教兩個虛擬變項。
- (5) 父母婚姻狀態：採取2000年家長問卷與2011年學生問卷的內容。2000年由受訪者回答自己的婚姻狀態為第一次婚、再婚、離婚、喪偶等，本研究關注非完整家庭對青少年GRA的影響，故以離婚或喪偶設為一類（非完整），其他設為另一類（完整），設定一個虛擬變項。2011年則由青少年回答父母是否離婚，勾選「是」為1，「否」為0。
- (6) 家庭收入：採取2000年家長問卷，為開放回答，依據分布狀態分成三大類：低收入組為平均月收入少於4萬5千的家庭，中收入組為月收入4萬5千到7萬之間的家庭，而高收入組則為月收入超過7萬的家庭。
- (7) 父親家務參與：採取2000年家長問卷的內容。父母家務分工定義為父親與母親在家務的相對分工情形，主要是利用此時期家長問卷填答者（父親或母親）在照顧孩子、煮飯作菜、清洗碗盤、清洗衣物、倒垃圾、買菜、清掃、修理水電等8項家事的分工情形。回答類別包括妻子為主，丈夫為主，夫妻一起，其他男性家人，其他女性家人，以及其他家人等六種。接著算出丈夫總分與妻子總分。丈夫總分是將丈夫為主指定為2分，夫妻一起1分，其他類別0分相加所得。妻子總分則是將妻子為主指定為2分，夫妻一起1分，其他類別0分，累加起

來的結果。最後以丈夫總分爲分子，丈夫總分與妻子總分之和爲分母，乘以100再加上0.5（以校正零的影響）即得父母家務分工相對分數。分數越高表示青少年父親的家務參與程度較高。

- (8) 家庭文化資本：採取2003年家長問卷。父母回答家裡除了課本以外的書之數量以及與配偶去聽音樂會、看舞蹈戲劇表演或參觀藝術展覽的頻率，前者的選項爲無、1-10本、11-20本、21-50本、51-100本、101-500本、500本以上，將此七級分別指定爲1、2、3、4、5、6與7分，分數愈高代表家中書籍愈多。後者的選項爲幾乎沒有、一年一兩次、幾個月一次、一個月一次、一個月一次以上，將此五等級分別指定爲5、4、3、2與1分，分數愈高代表參與藝術欣賞的頻率愈高。
- (9) 父母GRA：父母GRA之題目與青少年相同，不過父母親只於2000年回答此組題目，其內部一致性係數（ α ）爲.69。將6題GRA題目相加，分數愈高代表家長的GRA愈傾向男女平等。

4. 學校與社區因素

學校因素包括學業成績與班級女生比例，社區因素包括居住地區及宗教活動的參與。

- (1) 班級女生比例：採取2000年（國三）與2003年（高三）學生班級資料，以班上女生人數爲分子，全班人數爲分母，乘以100再加上0.5（以校正零的影響）即得班級女生比例，分數越高表示班級女生比例愈高。
- (2) 宗教活動的參與：採取2011年問卷，受訪者回答最近一年去寺廟、宮壇或教會的頻率，選項爲每星期數次、每星期一

次、每個月數次、每個月一次、一年數次、大約一年一次、從未參加，將此七級分別指定為7、6、5、4、3、2與1分，分數愈高代表宗教活動參與愈頻繁。

5. 控制因素

過去研究發現其他原生家庭背景因素對於一般人的GRA亦有顯著影響，爲了聚焦探討家庭社會化對於GRA的影響，在本研究中處理爲控制因素；包括父母年齡、家庭人口結構、族群、居住地區。而家長問卷填答者爲父親或母親，亦爲控制變項。

- (1) 父母年齡：父母年齡代表不同的世代背景，年齡較高的父母較可能遵循傳統的性別角色規範，影響子女有較傳統的觀念及行爲。本研究以父親年齡爲指標，由受訪者回答本身或其配偶的出生日期及其回答與子女之關係（父或母）交叉產生，代表父親在受訪當時（2000年）的實際年齡。
- (2) 家庭人口結構：擴展家庭受長輩的監督，比較可能遵循傳統的性別角色規範（李宜靜 1990；賴爾柔、黃馨慧 1996；呂玉瑕、伊慶春 2005）。按2000年學生問卷，以是否與上一代同住爲指標，分爲同住、未同住兩類。
- (3) 族群：族群的差異代表不同的文化與傳統，過去研究發現族群間的GRA及行爲有顯著差異（Morgan and Walker 1983；Harris and Firestone 1998；Bolzendahl and Myers 2004），在臺灣的研究亦發現外省族群的GRA較傾向非傳統（林鶴玲、李香潔 1999）。本研究以父親籍貫爲原生家庭所屬族群指標，按2000年學生問卷的回答類別分爲本省閩南，本省客家，大陸各省與原住民。

- (4) 居住地區：過去研究發現都市居民處於異質化與多樣性的生活環境，行為態度和價值觀呈現非慣俗的傾向，其GRA亦較非傳統取向（傅仰止、伊慶春 1994；傅仰止 1995）。青少年居住的城鄉背景反映社區性別規範的制約作用，居住區位都市化程度較高者可能較傾向非傳統態度。本研究採取2000年（國三）問卷，學生居住地區分為臺北市、臺北縣與宜蘭縣三類。
- (5) 家長問卷填答者：採取填答者為父親或母親的資料，其中母親占2/3，父親占1/3。父母類別代表不同的測度來源，因此列為控制變項。

（三）分析策略

本研究主要採取使用時間特定及時間變遷共變數成長模型（linear growth model with time-invariant and time-varying covariates）進行分析。由於男女扮演不同的性別角色，成長過程中的社會化歷程男女有別，其GRA的發展及變遷亦可能有差異。許多過去文獻指出男性比女性更傾向傳統的GRA（Kutner and Brogan 1974; Martin, Osmond, Hesselbart and Wood 1980；呂玉瑕 2011），且可能隨著成長階段而出現非線性的曲線變化。本研究的資料分析，首先採取t檢驗與成長模型分析，探討青少年及父母GRA是否因性別而有顯著差異，以及青少年GRA的變遷與方向在性別之間有否差異；若性別有顯著差異，接下來將分別針對青少男與青少女進行模型分析。

依據本研究圖1之架構，我們採取可同時分析時間特定因素與時間變遷因素的時間特定及時間變遷共變數成長模型，分別就青少女與青少

男進行探討，且進一步採取限制式男女群體模型比較，以檢視各個變項對GRA的影響是否存在性別差異。其具體作法為：首先將全部路徑設限制為男女相等，作為比較的基礎線（baseline）；接著逐步開放各個路徑（設男女不相等），檢驗其 χ^2 與基礎線 χ^2 之差距（變化量）是否達顯著水準。若此 χ^2 差距有顯著差異，則表示此路徑應開放，意味該變項對GRA的影響在青少年與青少年之間並不相等；若此 χ^2 差距未有顯著差異，則意味該變項對GRA的影響並無性別差異。

此四時期時間的間隔為3、3、3、5，將斜率負荷量數值分別設定為不等距的0、1、2、3.67與等距的0、1、2、3進行分析後，結果顯示設定為等距時之適配度較佳，且兩者路徑係數之顯著狀態一致，故採取斜率負荷數值為等距之結果。由於GRA屬於隨時間變動的變項，為避免平均數與變異數的變動產生測量失真，故以第一波平均數與標準差為基礎，將各波GRA進行標準化處理。最後就男女青少年進行分析，並逐一就各路徑係數進行男女模型比較。成長模型與時間特定及時間變遷共變數模型之分析乃使用M-plus軟體6.12版進行，其他分析則採取SAS軟體9.4版進行。

（四）遺漏資料之處理

追蹤資料易產生樣本流失的情形，由表1可知，本研究所使用的變項資料有相當多的遺漏值。過去已有一些研究指出，若直接將含有遺漏值的資料整筆刪除，可能造成結果與模型估計上的問題（Rubin 1987；蔡明璋 2004；Peng, Harwell, Liou and Ehman 2006），因此資料插補（data imputation），特別是多重插補法（multiple imputation）的使用就具有相當的重要性。本研究使用SAS統計軟體中的MI指令進行十次插補，求出

各次插補資料之變項平均值、標準差，並將此十個結果合併，以進一步進行性別差異t檢驗、成長模型、時間特定及時間變遷共變數成長模型。

五、研究結果

(一) 性別角色態度之性別差異及變遷趨勢

表2將青少年的GRA中「不贊成」與「非常不贊成」者合併，代表傾向非傳統（兩性平等）之人數與百分比，除了第六題關於妻子的就業或家庭角色優先的態度偏向傳統，其餘各項態度指標都顯示偏向非傳統的態度。對於傳統的GRA，包括家庭中男性主控、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區隔、勞動市場的男性優勢等，青少年皆持負面的態度，對於已婚女性就業則持正面的態度。然而雖然多數人贊成已婚女性的工作角色，當工作與家庭角色衝突時，多數青少年仍認為女性應選擇家庭角色。

關於GRA之男女平均值列於表3，以t檢驗分析性別差異的結果顯示，此四時期青少年男女的GRA均有顯著差異， $t=12.00\sim 15.43$, $p < .001$ ，女性的GRA較男性顯著傾向兩性平等，符合本研究的假設。

其次分別將青少男與少女的GRA標準化，以標準化分數進行成長模型分析，並採取限制式男女群體模型比較，檢視性別差異。結果顯示，在逐一開放的「截距」、「斜率」、「平方」與基準之間，GRA的「截距」無顯著男女差異（乃因其為標準化分數），「斜率」、「平方」的 χ^2 差距則達顯著水準（ $\Delta\chi^2 = 5.76、9.36$, $\Delta df = 1$, $p < .01$ ），意味青少年GRA的發展與變遷曲線，在青少年與青少男之間並不相同。將未設限之成長模型分析結果亦整理於表3，⁴由表3可知不論是青少年或青

⁴ 此模型之適配度為 $\chi^2=51.52$ （女=26.71, 男=24.81）， $df=2$, $p = .000$, RMSEA=.22,

表2 性別角色態度各題目傾向非傳統（兩性平等）之人數與百分比

	2000年 (國三)		2003年 (高三)		2006年 (大三)		2011年	
	女 人數	男 人數	女 人數	男 人數	女 人數	男 人數	女 人數	男 人數
	%	%	%	%	%	%	%	%
1. 家庭中大部分重要的事情應當要由男人來決定	440	392	464	400	410	339	430	392
	89.07	70.13	93.93	71.56	83.00	60.64	87.04	70.13
2. 當母親有工作的話，入學前子女比較容易受到不好的影響	367	383	392	405	402	398	347	356
	74.29	68.52	79.35	72.45	81.38	71.20	70.24	63.69
3. 丈夫的責任就是賺錢養家，妻子的責任就是照顧家庭	424	396	444	414	421	361	428	397
	85.83	70.84	89.88	74.06	85.22	64.58	86.64	71.02
4. 經濟不景氣需裁員時，應該先從（已婚）女性員工裁起	472	477	486	519	484	513	489	535
	95.55	85.33	98.38	92.84	97.98	91.77	98.99	95.71
5. 一般說來，男性比女性更適合當主管	459	432	478	452	469	433	460	443
	92.91	77.28	96.76	80.86	94.94	77.46	93.12	79.25
6. 在工作與家庭發生衝突時，太太應該以家庭為優先選擇	169	148	204	145	204	131	234	176
	34.21	26.48	41.30	25.94	41.30	23.43	47.37	31.48

少男，GRA之「截距」平均數未顯著而變異數則顯著（ $\gamma = .54、.41, p < .001$ ），表示GRA標準化分數之初始狀態在各個青少年之間的差異不明顯，但並不具同質性。青少男的GRA「斜率」平均數達顯著水準（ $\gamma = -.10, p < .05$ ），表示2000到2011十二年間，青少男的GRA隨著年齡增加而顯著趨向傳統；至於青少女GRA的斜率平均數則無顯著效果，12年間並無明顯趨向傳統或性別平等之趨勢，但其斜率變異數有顯著差異（ $\gamma = .03, p < .001$ ），意味青少女個體間的成長斜率具異質性。青少男與青少

SRMR=.04, CFI=.95, 依據Kline（2005）對於模型指標之建議（參考卡方值不顯著、RMSEA小於.08、CFI大於.90以上），此模型適配情形較差，有改善空間。考量不論男女之平方變異數均不顯著，故調整模型，將平方變異數設定為0，再次進行成長模型分析，發現適配度明顯提升，且 χ^2 差距並不顯著（ $\Delta\chi^2 = 5.93, \Delta df = 6, n.s.$ ），因此採取調整後模型（即平方變異數=0）。

表3 各時期性別角色態度平均值及成長模型分析結果

平均數與標準差	女性		男性	
	Mean	SD	Mean	SD
2000年（國三）	18.79	2.69	16.68	2.90
2003年（高三）	19.22	2.49	16.85	2.46
2006年（大三）	18.60	2.60	16.35	2.44
2011年	18.72	2.53	16.88	2.41
成長模型分析	γ	s.e.	γ	s.e.
截距 平均數	.03	.05	.04	.04
變異數	.54***	.06	.41***	.05
斜率 平均數	.06	.05	-.10*	.05
變異數	.03***	.01	.02+	.01
平方 平均數	-.03+	.02	.03*	.01
變異數	.00	.00	.00	.00
截距與斜率之相關	-.06**	.02	-.04*	.03

*** $p < .001$, ** $p < .01$, * $p < .05$, + $p < .10$,

$\chi^2=57.45$ (女=31.73, 男=25.72), $df=8$, $p = .000$, RMSEA=.10, SRMR=.04,

CFI=.95, TLI=.93, AIC=10268.83, BIC=10368.02, adj-BIC=10304.49

平方之變異數設定為0, 故未估算截距或斜率與平方之相關

女的GRA「平方」平均數分別達顯著水準與傾向水準 ($\gamma = .03$, $p < .05$; $\gamma = -.03$, $p < .10$)，青少年的GRA在十二年間呈現倒U型變化，於青少年初期或成年初期傾向傳統，但高中時期則傾向兩性平等；相反地，青少男的GRA則呈現U型變化，於青少年初期或成年初期趨向兩性平等，但大學時期則明顯趨向傳統。此外，青少年、青少男的GRA截距與斜率之間均有顯著負相關，表示GRA的初始分數愈高者，其後來發展變化會較為趨向傳統。

青少年的GRA在高中階段較國中時更傾向自主（雖未達到統計顯著性），可能由於當時的高中生已開始實施九年一貫教育的性別課程。根據對臺灣國中生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的成效研究（劉素芬 2005；葉嘉楠、王秀伶 2013），曾接受課程的男女學生之GRA比未上過課程者顯著更

傾向平等，女性尤其明顯。至於後來在大學時GRA轉趨傳統，推測可能因為進入交友擇偶階段。

（二）家庭背景、學校、社區因素對於青少年性別角色態度的影響：時間特定及時間變遷共變數成長模型

首先進行限制式男女群體模型比較，以檢視性別差異是否存在。結果顯示，在逐一開放的各個路徑與基準之間，僅2011年的在學或有偶狀態對2011年GRA的影響無顯著男女差異，其他路徑的 χ^2 差距均達顯著水準（ $\Delta\chi^2 = 6.79-224.98, p < .01$ ），意味基本上家庭背景、學校乃至於社區等絕大多數的因素對青少年GRA的影響，在青少女與青少男之間並不相同。

接著將男女無差異的路徑限制為相等，其他路徑開放進行估計，其分析結果整理於表4。其中截距平均數估計這些因素對GRA的初始影響程度，也就是家庭、學校及社區因素對青少年國三時期GRA的影響，而斜率與平方則估計這些因素對GRA變遷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不論男女，相較於原始成長模型（表3），加入家庭背景、學校、社區因素之後，GRA的變遷斜率或平方均變得不顯著，意味家庭背景、學校、社區因素可以充分解釋青少年至成年初期的GRA變遷。

1. 父母傳遞及家庭背景的影響

成長模型的分析結果（表4）對於解釋青少年GRA的形成與變遷的機制上，社會化理論與處境論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然而家庭背景對青少年GRA的影響並不如預期的顯著。以父母親的傳遞影響而言，父母本身的GRA對青少男或青少女均有顯著傳遞效果，父母GRA較開放者，

子女在初始的國三時期愈傾向兩性平等的態度 ($\gamma = .07, .05, p < .05$)，不過父母的GRA並未持續影響子女後來的GRA的變遷。以母親教育程度及職業而言，母親教育程度對於青少男的GRA變遷有顯著影響，母親教育程度愈高的青少男，GRA隨著年齡增長呈現U型變化，會先趨向傳統再轉向兩性平等 ($\gamma = .01, p < .05$)，而母親教育程度對於女生無顯著影響。

父母的社經地位特性因素中只有母親的職業地位顯著影響青少年的GRA；相對於母親為無工作者，若青少年的母親從事技術工或相關人員、民意代表或行政主管時，其國三時期的GRA越傾向平等 ($\gamma = .27, .37, p < .05$)，表示母親有穩定的職業生涯，對女兒會有角色示範的影響，影響她朝向性別平等的態度，支持社會化理論的預期。然而母親的職業地位並未持續影響女兒後來的GRA的變遷。

本研究發現父母的宗教信仰對於青少年的GRA無明顯影響，僅父母信仰基督宗教的青少女，其GRA隨其成長呈現略微傾向倒U型變化 ($\gamma = -.47, p < .10$)；此數據表示父母的信仰對於青少女在其成長期間的GRA變遷可能會產生傾向傳統的拉力。

相較於父母宗教信仰，青少年個人的信仰對其GRA的影響更大。以青少女而言，在國三時期個人宗教信仰對其GRA的影響不顯著。不過，信仰基督宗教的青少女，GRA隨著年齡增長呈現U型變化，會先趨向傳統再轉向兩性平等 ($\gamma = -.76, .24, p < .05$)，意味個人宗教信仰對青少女GRA的影響在國中以後的成長階段較為明顯。然而進入成年之後，信仰基督教的女性的GRA顯著傾向傳統 ($\gamma = -.64, p < .01$)，此部分乃支持處境論的解釋。

以青少男而言，個人的宗教信仰並無一致的影響。國三時信仰佛道宗教者，相較於無宗教信仰者，顯著呈現較傳統的GRA ($\gamma = -.26, p <$

.01)，符合假設預期。然而信仰基督宗教的青少男則顯著呈現兩性平等的GRA ($\gamma = .68, p < .05$)，可能由於信仰基督宗教的國中男生參與宗教組織的一般性活動較多，對於教義內涵接觸較淺，卻藉著這些活動擴展的網絡，接觸到較自主的價值觀。不過青少男國三時期個人的宗教信仰並未持續影響後來的GRA的變遷，而且青少男進入成人之後的宗教信仰對其GRA亦無顯著影響。

父母婚姻狀態及家務分工型態也顯著影響國三時期青少男初始的GRA。非完整家庭的青少男，其GRA愈傾向平等 ($\gamma = .40, p < .05$)，符合社會化理論預期的假設；即可能由於非傳統的父母婚姻關係的角色示範作用影響子女較不認同傳統的性別角色。父親家務參與程度愈高的青少男，其GRA明顯愈為傳統 ($\gamma = -.01, p < .01$)，與預期的角色示範假設相反。可能的解釋是家庭中父親參與家務較多的分工型態與社會傳統性別分工相異，使青春期中少男對男性角色的性別認同產生矛盾，反而誇大展現對男性陽剛性別角色的認同，故出現負向影響。然而青少年時期父母婚姻狀態及家務分工型態並未持續影響青少男後來的GRA的變遷。

分析結果發現家庭文化資本對於國中時期青少女GRA的形成與變遷有顯著影響，家中藏書愈多的青少女愈傾向兩性平等的態度 ($\gamma = .09, p < .01$)，但青少男並無此現象，符合假設的預期。如前所述，此可能因當前的性別階層結構，男性已得較高的社會認可，女性則需藉著家庭文化資本增強自我效能從而獲得社會認可 (DiMaggio 1982; Persell et al. 1992; Dumais 2002)。不過，家庭文化資本愈豐者，青少女的GRA隨著成長時期會先趨向傳統再轉向兩性平等 ($\gamma = -.09、.03, p < .05$)，顯示出家庭文化資本愈豐的青少女，在國三時較傾向自主平等的性別意識，卻在成長時期易受同伴的影響而調整。但是後來進入成年期後，隨著人

格發展趨向成熟，過去的家庭文化背景所養成較高的自我效能仍可能透過所接觸的處境脈絡，形成轉向平等自主發展的拉力。

2. 學校與社區生活經驗的影響

成長曲線模型的分析結果（表4）顯示，國三時期學校生活經驗對青少年GRA有重要影響。成績愈好者的GRA就愈傾向平等自主，男女皆然（ $\gamma = .17、.09, p < .01$ ）。此因學業成績反映學習的成果，學習成果愈佳愈可能吸收較廣較多元的資訊及觀念，從而愈傾向平等。由於傳統性別規範對於社會性別角色的分化，對女生而言，GRA與學業成績之間亦可能互為因果，一方面學習的成果愈佳愈可能吸收較多元的觀念，從而傾向平等態度；另一方面傾向非傳統態度的女生可能對未來的工作生涯有較高的抱負，因此投資較多時間及努力於學業，故成績較佳（Tallichet and Willits 1986; Ahrens and O'Brien 1996）。

我們也假設國中就讀班級的性別比例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性別文化，可能影響青少年的GRA。分析結果顯示，國中就讀班級的性別比例對青少男初始期的GRA無顯著影響，但顯著影響其GRA的變遷；國三班上女生比例較高的青少男，其GRA隨年齡增長顯著朝向非傳統變遷，再稍轉向傳統而調整（ $\gamma = .00, p < .05$ ）。此發現顯示出在國中階段女性比例較高時，帶來較著重人際關係和諧的同儕文化，在國三時期對於男女生的GRA皆無顯著影響，卻在進入成年時期影響男生較傾向平等的GRA。

學校分流帶來不同的生活經驗，也明顯影響青少年的GRA，就讀高中者比高職者顯著地傾向平等（ $\gamma = .20, p < .01$ ），可能因高中教育比高職較具有多元文化的特質。但就讀高中或高職對於青少男的GRA無顯著影響。至於高三時期或是畢業後三年（或升學者大三時期）的狀況，包括學校成績、班級女生比例或工作經驗，對青少年男女GRA的影響均不

表4 時間特定及時間變遷共變數成長模型之結果

	女性						男性					
	截距		斜率		平方		截距		斜率		平方	
	γ	SE	γ	SE	γ	SE	γ	SE	γ	SE	γ	SE
截距 / 斜率 / 平方	-3.19***	.64	.76	.78	-.06	.24	-1.35*	.54	.23	.64	-.04	.20
青少年基本特性												
基督教 (無信仰=0)	-.10	.28	-.76*	.34	.24*	.11	.68*	.33	-.65+	.39	.19	.12
佛道宗教 (無信仰=0)	-.10	.09	.11	.10	-.05	.03	-.26**	.08	.01	.10	.02	.03
原生家庭背景												
基督教 (無信仰=0)	-.01	.26	.41	.31	-.18+	.10	-.24	.30	.13	.35	-.04	.11
佛道宗教 (無信仰=0)	.16	.11	-.20	.13	.03	.04	-.01	.12	-.10	.14	.03	.04
父母性別角色態度	.07***	.02	.02	.02	-.01	.01	.05**	.02	.02	.02	-.01	.01
父親年齡	.01	.01	-.01	.01	.00	.00	.00	.01	.00	.01	.00	.00
本省閩南 (其他=0)	.00	.11	.11	.13	-.04	.04	.02	.10	-.13	.12	.04	.04
母親教育程度	.02	.02	.00	.02	.00	.01	.03	.02	-.03	.02	.01*	.01
家庭收入中等 (低=0)	.02	.10	-.08	.11	.02	.04	.18+	.10	-.22*	.11	.04	.03
家庭收入高等 (低=0)	.06	.11	.06	.13	-.02	.04	.18	.11	-.26+	.13	.05	.04
父親無就業 (非技術=0)	-.11	.16	.09	.19	-.03	.06	.04	.15	-.10	.18	.02	.05
父親技術工 (非技術=0)	-.15	.12	-.17	.14	.06	.04	.10	.11	.05	.13	-.02	.04
父親技術 / 助理 (非技術=0)	-.17	.17	.14	.19	-.02	.06	-.04	.15	.27	.18	-.09+	.06
父親民代主管 (非技術=0)	.01	.13	.04	.16	-.03	.05	-.18	.13	.27+	.15	-.07	.05
母親非技術 (無就業=0)	.12	.11	-.21	.13	.06	.04	.14	.11	-.02	.13	.00	.04
母親技術工 (無就業=0)	.27*	.11	.01	.13	-.03	.04	.03	.11	.07	.12	-.02	.04
母親技術 / 助理 (無就業=0)	-.01	.17	.04	.20	-.03	.06	.31	.19	.21	.23	-.11	.07
母親民代主管 (無就業=0)	.37*	.17	-.24	.20	.04	.06	.12	.16	.07	.19	-.06	.06
婚姻 (完整=0)	-.01	.18	.03	.22	-.01	.07	.40*	.16	-.31	.19	.06	.06
與上一代同住 (否=0)	-.07	.10	-.05	.12	.01	.04	.00	.10	.03	.11	-.01	.03
父親家務參與程度	.00	.00	.00	.00	.00	.00	-.01**	.00	.01	.00	.00	.00
家長問卷填答者 (母=0)	.11	.10	-.13	.12	.03	.04	-.16+	.09	.12	.11	-.04	.03

家庭文化資本											
家裡書籍	.09**	.03	-.09*	.04	.03*	.01	.03	.03	.04	-.01	.01
參與藝術欣賞	.02	.06	-.05	.07	.02	.02	.06	.06	-.10	.07	.02
學校與社區											
臺北市 (宜蘭=0)	.02	.12	.01	.14	-.01	.04	.07	.11	.04	.12	-.02
臺北縣 (宜蘭=0)	-.16	.11	.22+	.13	-.08+	.04	.17+	.10	-.07	.12	.03
國三成績	.17***	.03	-.06	.04	.01	.01	.09**	.03	-.07+	.04	.02+
國三班級女生比例	.00	.01	.00	.01	.00	.00	.00	.00	.01+	.00	.00*
2003變項→2003性別角色態度											
高三成績	.04+	.03					-.01	.02			
就讀高中 (高職=0)	.20**	.07					.06	.06			
未在學 (高職=0)	-.33	.29					-.02	.15			
班級女生比例	.00+	.00					.00	.00			
2006變項→2006性別角色態度											
有全職工作 (全職學生=0)	-.03	.13					-.14	.10			
曾打工 (全職學生=0)	.09	.11					-.14+	.07			
2011變項→2011性別角色態度											
有全職工作 (無全職=0)	.08	.10					-.06	.08			
在學 (未在學=0)	.22*	.09					.22*	.09			
有偶 (無=0)	-.18*	.09					-.18*	.09			
父母離婚 (未離=0)	.36**	.11					.18+	.11			
基督宗教 (無信仰=0)	-.64**	.24					-.09	.21			
佛道宗教 (無信仰=0)	.05	.08					-.08	.07			
宗教活動參與	.09*	.04					.04	.03			
截距與斜率之相關	-.04*	.02					-.02	.02			

*** $p < .001$, ** $p < .01$, * $p < .05$, + $p < .10$.

$\chi^2=208.08$ (女=124.35, 男=83.73), $df=144$, $p = .001$, RMSEA = .029, SRMR = .012,

CFI = .95, TLI = .89, AIC = 10152.52, BIC = 11203.91, adj-BIC = 10530.56

Ps. 2011年之在學 (未在學=0)、有偶 (無=0) 對性別角色態度影響無男女差異

明顯。

除了學校生活經驗，過去的文獻顯示居住社區的都市化程度會影響一般人的GRA的差異。本研究發現居住社區的都市化程度或社區生活經驗對青少年GRA的形成及變遷並無顯著的影響。無論青少年居住地區的都市化高低，其初始期的GRA以及後來變遷的型態皆未有明顯差異。我們推測，2000年代大眾媒體影響已十分廣泛，都會區異質化生活型態及多元活動的參與不一定會顯著影響青少年GRA趨向非傳統。

最後，我們發現成年後的生活經驗明顯影響成年後的GRA，符合處境論的假設預期。不論男女，仍在學者比未在學者的GRA顯著傾向平等（ $\gamma = .22, p < .05$ ）。過去文獻亦發現累積教育促進平等自主的GRA的作用，此因教育程度高者較可能吸收多元的觀念，亦可能目前學校的文化脈絡使學生較易接觸平權及個人自主的觀念（Wilkie 1993; Cunningham et al. 2005）。

進入成年期之後，有偶者比無偶者的GRA顯著傾向傳統（ $\gamma = -.18, p < .05$ ），與過去研究的發現一致。在當前家庭制度脈絡下，已婚者採取自主平等的GRA比未婚者需較大成本，因此較可能傾向傳統。

進入成年期的青少年中，父母離婚的青少女，其GRA明顯較傾向平等（ $\gamma = .36, p < .01$ ），但對男生的影響不顯著。相對於國三時期不完整家庭（其中父母離婚占半數）對於男生有顯著的影響，女生則無顯著影響，可能顯示青少年生命歷程中父母離婚的影響有性別差異。

此外成年後團體宗教活動參與會影響女生的GRA；與預期假設相反的是，女性參與愈多宗教團體活動者的GRA愈傾向平等（ $\gamma = .09, p < .05$ ）。我們推測，在日常生活中參與宗教性的團體活動如廟會、志工等，未必會深入宗教信仰內涵，然而參與較多宗教活動者也較可能參與非宗教的活動，故而接觸較多元的訊息。因此，控制了成年後個人的宗

教信仰的影響後，參與宗教團體活動愈多的女性，GRA較為平等。不過成年後參與團體宗教活動對於男性的GRA並無顯著影響。

六、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利用縱貫性的長期調查資料，透過成長曲線模型分析，呈現臺灣在進入21世紀的社會轉型中青少年GRA的形塑機制及動態的變遷軌跡，對青少年在成長歷程中GRA如何形成及變遷提供新的理解。

首先，本研究發現臺灣青少年的GRA普遍較傾向性別平等，與過去文獻所呈現成人的GRA有相當明顯的差異。2000年青少年國三時的GRA比當時民衆更傾向開放，⁵也顯著的比其父母世代的GRA更傾向平等自主。此可能由於青少年對於社會文化變遷敏感，他們對於性別角色傾向平等的態度反映了臺灣在1990年後漸趨多元價值觀的社會風氣，以及已婚女性就業逐漸普遍的現象。Fan and Marini（2000）檢視1980年代美國青少年的GRA變遷，該時期女權運動對於社會性別意識變遷的影響方興未艾，他們亦發現社會氛圍傾向開放時，青少年的GRA顯著傾向平等自主。

其次，本研究發現臺灣青少年在成長至成人的過程中，GRA有明顯男女差異；青少女比青少男更支持平等自主的態度，過去美國在1970年代以後社會傾向開放自由的風氣下，對於青少年的相關研究亦多呈現

⁵ 2001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中20-30歲民衆的性別角色態度顯示，50%女性及48%男性對於「當母親有工作時，家庭生活總是會受到妨害」，抱持非傳統的態度；68%女性及45%男性對於「丈夫的責任就是賺錢，妻子的責任就是照顧家庭」，表達非傳統的態度。而本研究顯示更高比例的青少年（前者女性74%及男性69%；後者女性86%及男性71%）對於這兩項性別角色的看法持非傳統態度。

此差異 (Thornton and Young-DeMarco 2001; Bolzendahl and Myers 2004; Brooks and Bolzendahl 2004; Davis 2007)，GRA在性別間的差異可能反映傳統文化規範期待男性與女性追求的利益結構不同，傳統文化下處於較不利社會位置的女性，較可能相信社會由傳統的性別規範轉向性別平等的變遷對她們較有利 (Mason and Lu 1988; Ridgeway and Correll 2004; Davis 2007)。因此透過家庭、學校及社會的學習過程，女性較可能認同非傳統的GRA。

青少年在成長期間的GRA會在過去基礎上維持穩定，還是會隨著經歷不同生活情境或經驗而改變？過去研究發現，青少年初期男性較女性傾向傳統，但成長期間，男性受所接觸社會環境的影響，會比女性更大幅度的轉向平等態度，因此性別間差距會隨成長而減小 (Fan and Marini 2000; Davis 2007)。然而本研究發現臺灣青少年的變遷趨勢不同；在初始期男性的GRA較女性傾向傳統，在初始期後的成長階段，男生有顯著朝向傳統變遷的趨勢而女性無明顯改變，性別間的差異並未隨著成長而拉近。此外青少年男女生較一般成人的GRA傾向平等自主，並於國中到高中期間持續增長，此可能由於當時九年一貫教育課程的實施或宣導使學校的文化脈絡有較多元的氣息。然而到了大學階段，男生的GRA顯著轉向傳統方向發展，可能反映男生成長至接近擇偶或婚姻階段，其觀念行為在華人家庭制度規範的氛圍下，較強調性別展現的陽剛文化。

為瞭解GRA形成及變遷的動態機制，我們以社會化理論及象徵互動論 (或處境論) 的觀點探討青少年成長階段的生命歷程中家庭、學校、社區因素對GRA的影響，並檢視不同時間點的生命歷程的因素 (life-course factors)。家庭社會化效果乃考量父母的GRA、家庭的社經地位、父母宗教信仰、父母婚姻型態、家務分工、家庭的文化資本對青少年GRA的影響；生活處境經驗效果則考量國高中、大學及成人階段的教

育經驗，大學與成人階段的工作經驗並考量進入成人階段時的就業、婚姻及宗教經驗的影響。

本研究分析結果發現青少年早期的家庭背景、學校生活及成人後的生活經驗都可以相當程度解釋青少年在生命成長歷程的GRA的形成及變遷，即社會化理論及處境論皆獲得一定程度的支持。以社會化效果而言，過去文獻所指出的重要的家庭社會化背景因素中，父母的GRA對國三時期青少年男女的GRA有相當顯著的傳遞影響，而家庭社經地位、母親教育程度及父母婚姻狀態只對於青少男有顯著的影響，母親的職業以及家庭文化資本只對青少女有顯著的影響，符合社會化理論的預期；其餘家庭背景因素包括家庭結構、父母的宗教信仰以及父母家務分工型態則未發現有預期的影響。不過，父親家務參與和成人宗教活動參與的缺失值相當高（42%和58%），雖採取了多重插補法，仍可能無法完整呈現此二變項的樣貌與效果，此為本研究資料的侷限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母親的職業地位對青少女的GRA有顯著的角色示範作用；母親有穩定工作生涯或較高職位者，女兒在國中時期較傾向平等自主的態度。其背後意涵可能是，在已婚女性就業普遍的2000年代，只有母親有較高職業地位或穩定的職業生涯，對女兒才有不同的性別角色示範的影響，並不是所有的就業母親。從事非技術工作或無穩定職業的母親所表達的性別角色示範效果與無就業母親無顯著差異。過去的研究如Acock, Barker and Bengtson（1982）亦發現在美國1980年代母親職業的特性，如職業地位及權力，比其就業的身份對於子女的GRA有更重要的影響。然而本研究也顯示母親職業地位示範效應並未持續影響女兒後來的GRA變遷。

成長模型的分析結果顯示，隨著青少年的成長，上述家庭社會化因素未必具有持續影響力。其中，早期父母的GRA、母親職業、父母婚姻

狀態皆在青少年國中之後的成長過程無持續的影響，其他因素的持續影響效應因性別而異。對於青少男而言，早期的家庭社經地位對於GRA的正向效應在成長過程中會轉向與初始期相反（傳統）的方向發展，而母親的教育程度在初始期無顯著影響，在成長的階段則影響其GRA顯著趨向平等自主的方向發展。對少女而言，國中時期家庭文化資本的顯著正向效應在後來的成長過程中仍持續作用，而父母的宗教信仰在初始期對子女別角色態度無顯著影響，在後來的成長階段，對於女兒GRA傾向傳統略有影響。

另一方面，分析結果更發現生活處境經驗對於青少年GRA的重要影響。教育經驗因素中，初始期的學業成績對於男女生的GRA都有顯著影響。而初始期的班級性別互動則顯著影響青少男後來階段的GRA；在國中時班級女性比例較高，帶來較著重和諧關係的同儕文化，影響男生在進入成年時期呈現較傾向平等的GRA。

此外，我們發現，高中階段的教育分流對於女生有顯著影響；就讀高中的女生顯著的比就讀高職者傾向平等自主的態度，然而對於男生無顯著影響。可能的解釋是高中的學校脈絡比高職培養較多元的觀念及價值觀，且由於傳統社會規範在利益結構上的性別差異，女性對於多元及平等的觀念較敏感，故教育分流的影響有性別差異。此外青少男同儕間的陽剛文化亦可能使他們的性別意識較不受學校文化氛圍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青少年進入成年後繼續升大學（或專科）的教育經驗顯著影響男女青少年的GRA傾向自主，過去許多研究也發現累積教育對於GRA變遷的影響（Fan and Marini 2000; Brewster and Padavic 2000; Ciabattari 2001）。這些研究指出在高等教育學校的文化氛圍可能培養學

生有較自主性、成就取向以及較平等的性別角色。⁶

本研究資料顯示在學階段及畢業後的工作經驗，無論打工或全職工作對GRA的發展皆無顯著影響。或許個人所接觸環境脈絡對個人觀念或態度的影響力需有較深厚的接觸經驗才發生（Davis 2007），本研究樣本中多數青年甫入職場，對於職場的性別或權力文化接觸尚未深入，故未顯出職場文化對個人觀念或態度產生的影響力。工作經驗的影響有待未來繼續搜集的追蹤資料進一步分析。

除了成人階段的教育經驗的影響，本研究發現青少年進入成年後的婚姻經驗及父母婚姻狀態顯著影響其GRA。進入婚姻者無論男女顯著較傾向傳統態度，而父母婚姻狀態的影響有性別差異。國中時期非完整的父母婚姻狀態顯著影響青少男較其他同伴傾向非傳統態度，對於女生卻無顯著影響。不過，在進入成年時期父母的離婚狀態，顯著影響女生傾向較平等的GRA，對男生反而無顯著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成人時期父母離婚的109個案中有1/3父母在其國中或之前就已離婚，但在國中時期未影響青少年GRA的形成，後來亦無持續影響其變遷。可能的解釋是青少年在較接近成年時期，父母的離婚較可能影響女兒較不認同傳統女性以家庭角色為重心的性別角色安排，因此傾向較平等的態度；而男性在早期對於婚姻生活的想像及認同尚模糊。⁷

⁶ 過去研究也指出逆向的因果關係（Tallichet and Willits 1986），即有較平等的性別角色態度者較可能追求更高的教育，尤其對女性而言；因有較平等的態度者，較可能投資時間繼續升學，預備未來的就業生涯。然而以青少年而言，學校教育在個人生涯選擇上較可能是優先考量；因此學校教育影響性別角色態度的作用比逆向的作用更為可能。

⁷ 交叉分析不同時間點父母婚姻狀態與性別角色態度，並無顯著差異。顯示父母在

由上述整理可知，家庭背景、學校、社區等生命歷程因素對於青少年GRA的形成及變遷有性別差異。以初始期的態度而言，影響女性GRA的有父母本身的GRA、母親就業及家庭文化資本，影響男性的包括父母GRA、父母婚姻狀態及父母家務分工。可以說影響青少年男女初始期態度的因素都是父母的角色示範相關的因素，且女性的初始態度還受到家庭文化價值的影響。以家庭社會化對於成長階段的GRA的持續影響而言，影響GRA變遷的因素主要是文化價值的因素；女性包括家庭文化資本及個人的基督教信仰，男性則包括母親教育及家庭所接觸的階層文化（社經地位）。

承上所述，以早期家庭社會化效果的持續性而言，父母角色示範的因素顯著影響起始期GRA的形成，卻未持續影響後來成長階段GRA的變遷；原生家庭中文化價值內涵會持續影響女性的GRA變遷，而家庭社經地位及班級的性別互動則較影響男性的GRA變遷，此結果表示隨著青少年的成長，父母的價值觀念（及家庭所接觸的階層文化）比其自身行為示範的影響更大。此外，以生活處境的影響而言，男生的GRA的變遷受同儕文化的影響較女生更大；而高中階段教育的分流則僅影響女生的GRA變遷。相對於早期父母不完整的婚姻狀態僅影響男生的GRA較傾向平等，在青少年成長後父母的離婚則僅顯著影響女性傾向平等。

青少年GRA的形成及變遷的性別差異透露出的信息是，隨著2000年代女性在公領域可見度的提昇，加上社會文化價值的多元化如漲潮般的影響（Inglehart and Norris 2003），由於傳統社會規範下利益結構的性別差異，女性較敏感於接受崇尚個人自主的思潮；無論原生家庭社會化或學校教育的文化價值內涵，對女性的影響大於男性。青少年早期的父母

早期離婚或在青少年成長階段及成人後離婚，皆影響成年後青少年的性別角色態度傾向平等的態度。

角色示範對於男生GRA的形成似有較顯著影響，然而相較於女性較受家庭及學校的文化價值的影響，男生的GRA變遷較受同儕文化，尤其是陽剛文化的影響。

整體而言，早期的家庭背景、教育經驗型塑了青少年初期的GRA，但隨著青少年成長及進入成人階段，早期形成的態度可能在後來經歷的生活處境中調整。過去對於青少年性別意識變遷的追蹤研究發現父母及原生家庭的社會化效果在子女成長後遞減（Davis 2007）或再現（Cunningham 2001），對於個人生命歷程的研究亦發現早期社會化經驗的影響在後來的境遇中（如就業、結婚）會轉向（Luker 1984; Gerson 1986）；透露出社會化的代理者會隨著生命歷程的不同社會脈絡而變化。然而究竟家庭社會化的機制與處境經驗的機制之間的關係如何？

前述從象徵互動理論的觀點，早期原生家庭的社會化過程中，父母及家人的特質及其互動所表達出性別的意涵，對於個人的性別展現（包括性別化、性別意識）有長遠的影響。而GRA指涉特定脈絡下的行為或觀念，在個人生命歷程進入相對應的生活脈絡中方能具體領會其實際內涵與意義（Cunningham 2001）。因此早期家庭社會化形成的性別展演符碼，在個人進入成人後的相對應處境脈絡（如交友、婚姻）中可能影響個人GRA及行為的變異性（Berk 1985; Perkins and DeMeis 1996; Cunningham 2001），即對早期社會化作用而言，處境脈絡是調節的因素（moderator）。

然而，同樣強調生活處境脈絡中的性別實作對於GRA及行為的影響，Liao and Yang（1995）則提出綜合社會化理論與處境論的觀點，認為個人早期家庭社會化背景因素會間接透過後來生命歷程的生活處境，影響個人的GRA變遷；換言之，處境脈絡是中介因素（mediator）。他們指出生命歷程的改變例如進入婚姻、有了子女、工作、遷移或社會結

構的變遷，會使人改變生活的處境。而個人在特定處境中，社會脈絡下的文化價值、個人在該處境脈絡的地位以及網絡關係會影響個人的GRA。而且，青少年早期原生家庭社會化背景因素會透過對於青少年後來的生命歷程所接觸的生活處境特性的影響，間接影響個人後來的GRA，較傳統的處境帶來較傳統的GRA。

本研究分析結果指出在當前臺灣社會文化傾向多元化的浪潮下，青少年成長中早期的家庭社會化作用對GRA的影響有部分被大環境下的學校或社區生活處境取代，亦有部分持續影響青少年GRA的變遷。就本文所探討之家庭社會化因素而言，父母角色示範作用的因素，在青少年國三以後的成長階段不再持續影響GRA的變遷；而家庭文化價值因素則持續的影響後來的變遷。例如在起始期，父母角色示範作用的因素包括父母GRA對男女青少年的顯著傳遞作用、母親職業地位對少女的顯著角色示範作用、以及父母婚姻狀態、父母家務分工模式對於青少男的顯著影響，在後來的發展階段皆不再持續影響GRA的變遷，因此原生家庭角色示範的影響可能會被後來處境經驗的影響所取代。另一方面，家庭文化價值的因素包括家庭文化資本因素及母親教育程度對於青少年傾向平等自主的態度的影響，則在青少年成長階段仍持續影響GRA的變遷。

原生家庭文化價值因素的持續影響作用，支持Greenstein（1996）等的觀點，即早期家庭社會化形成的性別符碼，在進入成人後的相對應處境脈絡中可能影響個人性別角色及其態度的變異性。例如母親教育對青少男的GRA的影響。青少男早期家庭社會化過程中，母親教育程度較高者，形成較平等自主的性別符碼，對於青少男國三時期GRA並無顯著影響，然而進入成人階段後在相對應的人際關係脈絡處境，成為人際互動中性別意識展現的判準參考，顯著影響其GRA傾向平等。

然而根據Liao and Yang（1995）的綜合理論，代表早期家庭社會化

作用的母親教育程度的效應亦可能透過後來的生活處境的網絡關係間接影響後來的GRA。即母親教育程度較高的青少男在早期形成較異質性的價值觀，雖然並未立即顯著傾向較平等的性別意識，卻影響他進入成人階段後的生活境遇，較可能接觸較開放文化的社會網絡，間接影響他的GRA傾向較平等的方向變遷。

以家庭文化資本對於青少年的持續影響而言，家庭文化資本顯著影響青少年初始期的GRA傾向平等自主的態度，並在進入大學時期或之後，持續影響其顯著傾向平等態度的方向變遷。根據性別符碼的觀點，其背後機制可能由於原生家庭社會文化資本較豐富者，在進入成人階段後，在相對應的人際關係脈絡處境中，過去家庭社會化所學習的較平等自主的性別符碼，成為人際互動中，性別意識展現的參考，影響其GRA傾向平等。另根據Liao and Yang（1995）的綜合理論，原生家庭文化資本的影響也可能透過後來的生活處境的社會網絡間接影響GRA，即原生家庭文化資本較豐富的女性，由於所培養的自我效能及較平等的性別意識，在進入成年時期的生命歷程中較可能接觸到異質性文化的社會網絡處境，間接影響其GRA持續傾向平等。

除了原生家庭社會化因素，早期的學校經驗亦持續影響成年後的GRA。本研究發現國中就讀班級女生比例較高的青少男，後來生命歷程中，其GRA顯著朝向平等方向變遷。可能由於班級女生比例較高，展現較著重人際和諧的同儕文化及較弱的陽剛文化，使男生在國中時期形成較平等的潛在性別符碼，當進入成年階段相對應的人際關係脈絡處境中，（例如自己或周遭同伴結交異性朋友或進入婚姻），成為性別意識展現的參考，影響其傾向平等的GRA。同樣的，此種持續影響亦可能經由間接影響的機制，即國中時期班級性別比例可能影響青少男在國中時期形成潛在的性別符碼。在進入成年階段，透過所接觸的社會網絡關係

特質，間接影響GRA變遷；較平等的潛在性別符碼影響青少男接觸較異質性的網絡關係，導致傾向較平等的GRA。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青少年的GRA隨著長大成人的生命歷程中生活處境脈絡的變遷而波動，而家庭社會化作用的影響可能是隱微的、長程的與間接的。至於青少年早期家庭社會化作用與成長階段的生活處境脈絡影響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青少年成長階段的生活處境脈絡作為調節（moderating）家庭社會化作用的因素，影響GRA的變遷，抑或社會化作用透過近期的生活處境脈絡特質，間接影響GRA的變遷？本研究並未探究此機制，未來研究可利用結構性的因果路徑模型來探討青少年生命歷程因素，進一步深入分析生命歷程中原生家庭、學校、社區生活經驗與GRA形成及其變遷的因果關係。

此外，過去研究曾指出父母角色示範作用的效果會隨著青少年生命歷程的不同時間點而有差異（Thornton et al. 1983; Cunningham 2001）；父母本身的GRA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性別角色展現（如家務分工）對子女GRA的影響，於不同生命階段可能大為不同。若能在青少年成長階段的同時時間點同時測量青少年與父母特質及家庭角色配置，將更有助於釐清父母傳遞或家庭社會化背景對青少年GRA形成及變遷的影響機制。

臺灣在1980年代後，於經濟、政治及社會層面，皆展現了比過去較為多元的現象，而進入2000年代隨著社會文化價值更多元化，在勞動、家庭及教育方面實施許多法律及政策上的改革，推動性別平等的理念。2000年代的青少年在臺灣社會快速轉型的時期成長，急遽的社會變遷是否導致特殊的成長軌跡，是重要的研究議題，但是比較不同社會情境下GRA形成軌跡的差異，需與過去世代的比較。然而目前為止，並未見針對臺灣青少年GRA的發展狀況或變遷進行實徵資料分析的研究。雖然有少數社會心理學取向對於青少年性別角色發展的研究，分析了青少年的

性別角色特質類型及影響因素（何英奇1981；黃文三 1998），但與本文所探討青少年對於家庭／社會中的性別角色安排的態度，有不同的概念及意涵，無法直接進行比較。

倘若與過去的國外研究文獻比較，本研究則出現值得注意的影響機制差異。一些過去文獻發現有重要影響的社會化因素，本研究並無一致的發現。例如對臺灣2000年國中青少年而言，父母角色示範的社會化作用只影響起始期的GRA，而無持續影響，父母家務分工、父母宗教信仰並無預期的影響。可能透露出在傾向開放、平權的社會氛圍如漲潮般的影響青少年的GRA傾向平等自主之際，減弱了家庭社會化的影響。

目前「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的樣本雖已成年，但就業狀況仍未穩定，進入婚姻者亦屬少數，工作與家庭對其GRA的影響尚不明顯。或許個人所接觸環境脈絡對個人觀念或態度的影響力需有較深厚的接觸經驗才發生（Davis 2007）。未來更多個案進入較穩定的工作狀態或成立家庭後，將可進一步延伸探討自2000年開始，青少年進入不同社會脈絡並經歷不同的性別角色經驗後，個人的GRA如何調整或建構。利用更長時間的資料，將能更準確觀察早期父母的傳遞及家庭社會化作用的持續與否，也更能深化本研究所探討家庭社會化與社會處境兩者交織影響青少年GRA建構的機制。

作者簡介

呂玉瑕，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領域為家庭社會學、勞動研究、性別與工作。近期研究包括臺灣民衆性別意識變遷、青少年性別角色態度發展、家庭企業與夫妻夥伴關係、家庭企業女性的勞動參與、社會變遷中客家家庭性別權力關係等。

周玉慧，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領域為社會心理學、人際溝通與互動、生活壓力與社會支持、婚姻與家庭心理學、青少年心理學。目前主要研究議題包括青少年親子關係、夫妻互動、家人關係、社會支持、中年危機、價值觀、休閒參與等。

參考書目

- 伊慶春、高淑貴，1986，〈有關已婚婦女就業的性別角色態度〉。《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專刊》70: 1-27。
- 行政院主計處，2007，《勞動力統計》。行政院主計處統計報告。
- 呂玉瑕，1981，〈社會變遷中臺灣婦女的事業觀：婦女角色意識與就業態度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50: 111-143。
- ____，1982，〈現代婦女之角色態度的價值延伸現象〉。《思與言》20(2): 135-150。
- ____，2011，〈臺灣民眾性別角色態度的變遷：1991-2001〉。《臺灣社會學刊》48: 51-94。
- 呂玉瑕、伊慶春，2005，〈社會變遷中的夫妻資源與家務分工：臺灣七〇年代與九〇年代社會文化脈絡的比較〉。《台灣社會學》10: 41-94。
- 李宜靜，1990，〈雙工作家庭家事分工及其影響因素之探討〉。《家政教育》12: 49-56。
- 李美枝、鍾秋玉，1996，〈性別與性別角色析論〉。《本土心理學研究》6: 260-299。
- 何英奇，1981，〈大學生性別角色與自我概念的關係〉。《教育心理學報》14: 221-230。
- 何青蓉，1986，《國中生知覺的父母教養態、性別角色與其個人性別角色的關係》。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何金針，1987，〈國中學生性別角色與生活適應、學習成就之關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集刊》29: 165-174。
- 林鶴玲、李香潔，1999，〈臺灣閩、客、外省族群家庭中之性別資源配

- 置)。《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1(4): 475-528。
- 林大森，1999，〈臺灣地區 家庭背景對中等教育分流的影響：「高中／高職」與「公立／私立」差異的探討〉。《東吳社會學報》8: 35-77。
- 法務部，2014，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Index.aspx>，取用日期：2014年11月20日。
- 黃文三，1997，〈青少年後期性別角色發展及其相關因素之比較研究——以高雄師大82-84學年度大一新生為例〉。《高雄師大學報》8: 45-74。
- ____，1998，〈近三十年來我國青少年性別角色研究的回顧與分析〉。《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學刊》14: 231-274。
- 教育部，1976，《中華民國高級職業學校法》。
- ____，1979，《中華民國高級中學法》。
- ____，1994《中華民國教育統計》。
- 傅仰止，1995，〈都市人的非慣俗傾向〉。《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刊》24: 35-98。
- 傅仰止、伊慶春，1994，〈容忍態度的結構肇因：都市背景、遷移經驗、異質聯繫〉。《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6(2): 257-301。
- 葉嘉楠、王秀伶，2013，〈性別平等教學方案對學生性別角色態度影響之研究——以新竹縣某國民中學為例〉。《中華行政學報》12: 123-146。
- 鄒慧英，1989，《高中男、女分校與其學生性別角色、成就動機之關係》。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廖年淼、劉孟珊，2004，〈我國高中職教育資源投入之比較分析〉。《教育政策論壇》7(1): 41-58。

- 蔡明璋，2004，〈臺灣夫妻的家務工作時間：親密關係的影響〉。《台灣社會學》8: 99-131。
- 劉素芬，2005，〈由「性別角色態度量表」看性別教育通識課程之教學成效〉。《通識教育》12(1): 1-26。
- 賴爾柔、黃馨慧，1996，〈已婚男性參與家務分工之研究〉。《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41: 10-18。
- 簡文吟、薛承泰，1996，〈臺灣地區已婚婦女就業型態及其影響因素〉。《人口學刊》17: 113-134。
- 鍾鳳嬌，1989，〈母親就業、性別角色、事業觀、生活滿意度與國中生性別特質、生活適應之關係〉。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Acock, Alan C., Deborah Barker and Vern L. Bengtson, 1982, "Mother's Employment and Parent-Youth Similari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4: 441-455.
- Acock, Alan C. and Vern L. Bengtson, 1978, "On the Relative Influence of Mothers and Fathers: A Covariance Analysis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Socializa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0: 519-530.
- Ahrens, Julia A. and Karen M O'Brien, 1996, "Predicting Gender-Role Attitudes in Adolescent Females: Ability, Agency, and Parental Factor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0(3): 409-417.
- Bandura, Albert, 1977, *Social Learning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Berk, Sarah Fenstermaker, 1985, *The Gender Factory: The Apportionment of Work in American Households*. New York: Plenum.
- Betz, Nancy E. and Gail Hackett, 1981, "The Relationship of Career-Related

- Self-Efficacy Expectations to Perceived Career Options in College Women and Men.”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8(5): 399-410.
- Biddle, Bruce J., Barbara J. Bank and Marjorie M. Marlin, 1980, “Parental and Peer Influence on Adolescents.” *Social Forces* 58(4): 1057-1079.
- Blair, Sampson, 1992, “The Sex-Typing of Children’s Household Labor: Parental Influence on Daughters’ and Sons’ Housework.” *Youth and Society* 24: 178-203.
- Blee, Kathleen M. and Ann Tickamyer, 1995, “Racial Differences in Men’s Attitudes About Women’s Gender Rol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7: 21-30.
- Block, Jeanne H., 1984, *Sex Role Identity and Ego Development*.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Blumer, Herbert,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Bolzendahl, Catherine I. and Daniel J. Myers., 2004, “Feminist Attitudes and Support for Gender Equality: Opinion Change in Women and Men, 1974-1998.” *Social Forces* 83(2): 759-789.
- Bourdieu, Pierre, 1973,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Pp.71-112 in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edited by Richard Brown. London: Tavistock.
- Bowen, Howard R.,1977, *Investment in Learning: 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 Value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Bram, Susan, 1984, “Voluntarily Childless Women: Traditional or Nontraditional?” *Sex Roles* 10(3-4): 195-206.
- Brewster, Karin L. and Irene Padavic, 2000, “Change in Gender Ideology,

- 1977-1996: The Contributions of Intracohort Change and Population Turnove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2(2): 477-487.
- Brinkerhoff, Merlin B. and Marlene MacKie, 1985, “Religion and Gender: A Comparison of Canadian and American Student Attitud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7: 415-429.
- Brooks, Clem and Catherine Bolzendahl, 2004,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Gender Role Attitudes: Cohort Replacement, Social-Structural Change, and Ideological Learn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3(1): 106-133.
- Charles, Maria and Erin Cech, 2010, “Cross-National Beliefs about Maternal Employment.” Pp.147-174 in *Dividing The Domestic: Men, Women, and Housework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Judith Treas and Sonja Drobni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iabattari, Teresa, 2001, “Changes in Men’s Conservative Gender Ideologies: Cohort and Period Influences.” *Gender and Society* 15(4): 574-591.
- Connell, R. W., 1998, “Gender Politics for Men.” Pp.225-236 in *Feminism and Men: Reconstructing Gender Relations*, edited by Steven P. Schacht and Doris W. Ewing.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Corrigall, Elizabeth A. and Alison M. Konrad, 2007, “Gender Role Attitudes and Career: A Longitudinal Study.” *Sex Roles* 56(11-12): 847-855.
- Cowan, Carolyn Pape, and Philip A. Cowan, 1992, *When Partners Become Parents: The Big Life Change for Coupl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Cunningham, Mick, Ann Beutel, Jennifer S. Barber and Arland Thornton, 2005, “Recipro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Attitudes about Gender and Social Contexts during Young Adulthoo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4(4): 862-892.

- Cunningham, Mick, 2001,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n Children's Attitudes toward Gender and Household Labor in Early Adulthoo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3: 111-122.
- _____, 2008,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the Male Breadwinner, Female Homemaker Family Model: Influences of Women's Employment and Education over the Lifecourse." *Social Force* 87(1): 299-323.
- Davis, Shannon N., 2007, "Gender Ideology Construction from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6(3): 1021-1041.
- DiMaggio, Paul, 1982,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 Success: The Impact of Status Culture Participation on the Impact of Status Culture Participation on the grades of U.S. High School Stud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 189-201.
- Dumais, Susan A., 2002, "Cultural Capital, Gender, and School Success: The Role of Habitu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5: 44-68.
- Eder, Donna and Stephen Parker, 1987,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Gender: The Effect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on Peer-Group Cultur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0(3): 200-213.
- Fan, Pi-Ling and Margaret Mooney Marini, 2000, "Influences on Gender-Role Attitudes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9(2): 258-283.
- Funk, Richard B. and Fern K. Willits, 1987, "College Attendance and Attitude Change: A Panel Study, 1970-81."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0: 224-231
- Gerson, Kathleen, 1986, *Hard Choices: How Women Decide About Work, Career and Motherhoo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reenstein, Theodore N., 1996, "Husbands' Participation in Domestic Labor:

- Interactive Effects of Wives' and Husbands' Gender Ideolog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8: 585-95.
- Goffman, Erving, 1977, "The Arrangement between the Sexes." *Theory and Society* 4(3): 301-331.
- Harris, Richard J. and Juanita M. Firestone, 1998, "Changes in Predictors of Gender Role Ideologies among Women: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Sex Role* 38(3-4): 239-252.
- Hertel, Bradley R. and Michael Hughes, 1987, "Religious Affiliation, Attendance, and Support for 'Pro-Family' Issu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Forces* 65(3): 858-882.
- Hochschild, Arlie, 1989, *The Second Shift*. New York: Avon Books.
- Huber, Joan and Glenna Spitze, 1981, "Wives' Employment, Household Behaviors, and Sex-Role Attitudes." *Social Forces* 60(1): 150-169.
- Inglehart, Ronald and Pippa Norris, 2003, *Rising Tide: Gender Equality and Cultural Change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iecolt, K. Jill and Alan C. Acock, 1988,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Family Structure on Gender-Role Attitud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0: 709-717.
- Kline, Rex B., 2005,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2nd ed.)*. New York: Guilford.
- Koopman-Boyden, Peggy G. and Max Abbott, 1985, "Expectations for Household Task Allocation and Actual Task Allocation: A New Zealand Stud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7: 211-219.
- Kulik, Liat, 2002, "The Impact of Social Background on Gender-Role

Ideology: Parents' Versus Children's Attitude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3(1): 53-73.

Kutner, Nancy G. and Donna Brogan, 1974, "An Investigation of Sex-Related Slang Vocabulary and Sex-Role Orientation among Male and Female University of Studen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6(3): 474-483.

Liao, Tim Futing and Cai Yang, 1995, "Socialization, Life Situations, and Gender-Role Attitudes Regarding The Family among White American Wome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8(2): 241-260.

Luker, Kristin ,1984, *Abor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Motherhoo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rtin, Patricia Yancey, Marie Withers Osmond, Susan Hesselbart and Meredith Wood, 1980, "The Significance of Gender as A Social and Demographic Correlate of Sex Role Attitudes." *Sociological Focus* 13: 383-396.

Mason, Karen Oppenheim, John L.Czajka, and Arber Sara, 1976, "Changes in U.S. Women's Sex-Role Attitudes, 1964-1974."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1: 573-596.

Mason, Karen Oppenheim and Yu-Hsia Lu, 1988, "Attitudes toward Women's Familial Roles: 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5." *Gender & Society* 2(1): 39-57.

Mason, Karen Oppenheim and Larry L. Bumpass, 1975, "U.S. Women's Sex-Role Ideology, 197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0(5): 1212-1219.

Morgan, Carolyn Stout and Alexis J. Walker, 1983, "Predicting Sex Role Attitude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46: 148-151.

- Morgan, S. Philip and Linda J. Waite, 1987, "Parenthood and the Attitudes of Young Adul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541-547.
- Mortimer, Jeylan T. and Roberta G. Simmons, 1978, "Adult Social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 421-454.
- Mulkey, Lynn, 1993, *Sociology of Educati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llege Publishers.
- Peng, Chao-Ying Joanne, Michael Harwell, Show-Mann Liou and Lee H. Ehman, 2006, "Advances in Missing Data Methods and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Pp.31-78 in *Real Data Analysis*, edited by Shlomo Sawilowsky. Greenwich, CT: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 Perkins, H. Wesley and Debra K. DeMeis, 1996, "Gender and Family Effects on the 'Second-Shift' Domestic Activity of College-Educated Young Adults." *Gender & Society*, 10(1): 78-93.
- Persell, Caroline H., Sophia Catsambis and Peter W. Cookson, Jr., 1992, "Differential Asset Conversion: Class and Gendered Pathways to Selective Colleg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5: 208-225.
- Powell, Brian and Lala C. Steelman, 1982, "Testing an Undertested Comparison: Maternal Effects on Sons' and Daughters' Attitudes toward Women in the Labor Forc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4(2): 349-355.
- Ridgeway, Cecilia L. and Cardell K. Jacobson, 1979,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Role Ideology: Impact of Personal Confidence during Adolescence." *Youth and Society* 10(3): 297-315.
- Ridgeway, Cecilia L. and Shelley J. Correll, 2004, "Unpacking The Gender

Syste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Gender Beliefs and Social Relations.” *Gender & Society* 18(4): 510-531.

Rindfuss, Ronald R., Karin L. Brewster and Andrew L. Kavee, 1996, “Women, Work, and Children: Behavioral and Attitudinal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2(3): 457-482.

Rubin, Donald B., 1987, *Multiple Imputation for Nonresponse in Surveys*. New York: Wiley.

Scanzoni, John and Greer L. Fox, 1980, “Sex Roles, Family and Society: The Seventies and Beyon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2: 743-756.

Stockard, Jean, 1980, “Developing Attitudes toward the Role of Women: A Comparison of Females and Males.” *Youth and Society* 12: 61-82.

Tallichet, Suzanne E., and Fern K. Willits, 1986, “Gender-Role Attitude Change of Young Women: Influential Factors from a Panel Stud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49: 219-227.

Tangri, Sandra S., 1972, “Determinants of Occupational Role Innovation among College Wome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8(2): 177-200.

Thornton, Arland and D. Freedman, 1979, “Changes in the Sex Role Attitudes of Women, 1962-1977: Evidence from A Panel Stud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5): 831-842.

Thornton, Arland, Duane F. Alwin and Donald Camburn, 1983, “Causes and Consequence of Sex-Role Attitude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211-227.

Thornton, Arland and Linda Young DeMarco, 2001, “Four Decades of Trends in Attitudes Toward Family Issu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1960s through the 1990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3(4): 1009-1037.

Thrall, Charles A., 1978, “Who Does What? Role Stereotyping, Children’s Work, and Continuity between Generations in the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 *Human Relations* 31: 249-65.

Wagner, David, Rebecca S. Ford and Thomas W. Ford, 1986, “Can Gender Inequalities Be Reduc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47-61.

Walzer, Susan, 1998, *Thinking about the Baby: Gender and Transitions into Parenthoo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Webster, Harold, Mervin B. Freedman and Paul Heist, 1979, “Personality Change in Students.” Pp. 233-242 in *College and Character*, edited by Nevitt Sanford and Joseph Axelrod. Berkeley, CA.: Montaigne.

West, Candace and Don H. Zimmerman, 1987, “Doing Gender.” *Gender & Society* 1(2): 125-151.

White, Lynn K. and David B. Brinkerhoff, 1981,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Evidence from Childhood.” *Social Forces* 60: 170-181.

Wilkie, Jane Riblett, 1993, “Changes in US Men’s Attitudes toward the Family Provider Role, 1972-1989.” *Gender & Society* 7(2): 261-279.